

海岛苦少年

1892年8月10日,张云逸出生于海南岛东北文昌县上僚村。这个小村庄距文昌只有约5公里,是一个山青水秀、富饶美丽的地方。

按照张氏家谱,云逸属于‘运’字辈,幼时取名运镡,乳名益友。稍长大一点,他又用过张胜之的名字。参加革命后,他根据广东话‘运镡’二字的谐音,改名张云逸。

张家是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祖祖辈辈给地主打长工。张云逸的父亲张璟琚是一个诚实正直的农民,会干各种农活。在农忙季节,他除了种好自己的庄稼以外,常常主动地、无偿地帮助村里的农民兄弟犁田、耙田及干别的农活。由于他熟练的劳动技能和待人厚道、乐于助人的好品德,使他赢得了上僚村农民们的尊敬和爱戴。张云逸的母亲邢氏勤劳俭朴,心地善良。她除了同男人一样参加各种农田劳动之外,在家里还要承担做饭织布、缝补衣服等繁重的家务劳动,张璟琚和邢氏勤劳、

朴实和关心他人的美德对幼年的张云逸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璟琚和邢氏共有6个孩子。全家只有一亩多水田和一点坡地。为了维持一家8口人的生活,他们除了耕种自己的田地外,还租种别人的一些田地。由于人口多,土地少,劳动力不足和地主阶级的酷残压迫剥削,全家生活十分困难,常常只能以红薯芋头和可以照见人影的稀饭充饥。

张璟琚和邢氏饱尝了旧社会的辛酸,为了让自己的儿子摆脱当牛做马的命运,他们日夜操劳,省吃俭用,想方设法要供儿子读一点书。张云逸7岁时进了本村长发小学学习。

张云逸是家中的长子,苦难的家史,贫困的生活,父母亲的终年劳累,使他很早就懂得为大人分忧,他很小就开始跟随大人参加家务劳动和生产劳动。进小学后,他一面读书,一面利用课余时间参加劳动。在学校里,他学习刻苦,深受老师和同学们的赞赏。家里穷,买不起笔墨纸砚,他就捡来树枝作笔,在地面上练习写字,遇上不懂的问题,他总是要寻根问底,把它弄个水落石出。功夫不负有心人,辛勤的汗水换来了优秀的学习成果,每个学期考试后学校放榜,他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回到家里,放下书包,他就忙个不停,不是挑水煮饭、喂猪,就是去放牛、挑谷子等。

一天中午,天气晴朗,阳光和煦,和往常一样,云逸又放牛去了。他把牛放在村边吃草,自己则坐在树下看书。由于全神贯注,很快他就把一切都忘记了,而牛一边吃一边走。过了一段时间,他突然想起该上学了,这时他才发现牛已经走得很远了,他急忙去把牛找回来,又马上向学校跑去。由于路途远,当他气喘吁吁地赶到学校时,老师已开始上课了,老师问他为什么迟到,他如实地把原因说了。老师对这位勤劳好学的好学生深表同情,没有对他讲任何责备的话。

考入黄埔陆小

高小毕业后，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张云逸无法继续升学，在家里参加生产劳动。云逸的四叔张璟起是一个侨乡邮递员，每年往返于文昌县和越南之间，为华侨带信带物。他认识本乡横山村的赵某，赵的儿子赵士槐是驻广州清军的一名军官。一次，赵士槐回海南岛探家，张璟起为了给侄儿找一个谋生的职业，请求赵士槐把云逸带到广州去。赵士槐见张云逸聪明能干，答应了张起的要求，张璟起为儿子向张氏宗族借了路费。张云逸到了广州后即在赵家当勤杂工。

少年的张云逸人穷志不穷。在赵家，他虽然每天从早忙到晚，挑水、煮饭、擦窗户、拖地板，样样活都干。但一有空就抓紧时间看书学习。

赵士槐是一个有正义感的青年军官，在日本士官学校留过学，受过一些西方资产阶级新思潮的影响。他亲眼看到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由于重视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生产发展很快，国家一天天强大

起来，他痛切地感到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社会的落后和黑暗，他对张云逸为人诚实，劳动勤快、勤奋学习的表现十分满意。他不但没有阻挠张云逸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文化知识，而且还给予鼓励。1908年，广州陆军小学招生，赵士槐动员和支持张云逸去报考。

广东陆军学校位于广州市东南面的黄埔，又称黄埔陆军小学这是清政府为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在广东设立的一所培养初级军官的学校。该校面向全省招生，学制三年，招收对象为广东各高等小学学生及青年军人。由于是公费学校，报考的人很多，一个县就有成千参加，而录取的人数只占报考人数的千分之几。张云逸利用工作之余，作了短时间的准备，即参加应考，并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

陆军小学完全按照清政府军队中的规章制度，来安排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学生们每天除了要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外，还要上六节课，学习国文、数学、步兵操典、军队内务、陆军礼节等课程。尽管这里的生活紧张而艰苦，但比起张云逸在家里喝米汤吃杂粮的生活，那就好得多了。

云逸是在完全没有得到家里任何经济支持的情况下，开始他在陆军小学的学习生活的。在学习上，他专

心致志，全力以赴，节假日同学都上街去了，他则很少外出，而留在校内坚持学习。他同届学习的同学有 130 人，由于他学习刻苦，每次考试成绩他都遥遥领先，经常得到学校的奖励。在生活上，他艰苦朴素，节省开支，从不乱花一分钱。他把每个月节省下来的生活津贴和他每次获得的奖学金积存起来，还清了他父亲为他到广州向张氏宗祠所借的款项。

同盟会会员

张云逸在陆军小学学习期间，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日益加深，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孙中山为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于1905年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全国各地反对清王朝的武装起义又此起彼伏，在全国反清斗争迅速发展的形势推动下，被清政府严密控制下的广东陆军小学，也秘密地建立了同盟会组织。

张云逸来自海南岛的农村，苦难的家史和本村贫苦农民在地主豪绅阶级压榨下的悲惨境遇，使他很小就懂得仇恨剥削者和压迫者。到广州后，他目睹帝国主义同清朝统治者互相勾结，残害中国人民的一桩桩事实，更激起他对清政府和帝国主义的无比愤怒。他逐步成为一个关心祖国命运和人民安危的青年爱国者。在陆军小学，他同进步学生一起暗中传阅革命进步书刊，谈论国事，抨击清政府的腐败无能。

民主革命宣传家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满怀革命的激情，用通俗的语言，犀利

的笔锋，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和清政府的走狗本质，号召人民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清政府，建立“中华共和国”。张云逸读了这些书后，常常激动得夜不能寐。他感觉到这些书完全说到他心里了。他完全赞同邹容等人的革命主张，他对同窗好友郑乃言说：“世道这样黑暗，老百姓在水深火热中挣扎，不推翻清政府就不能救中国，我们参加同盟会去！”陆军小学同盟会组织经过观察了解，知道张云逸反清态度坚决，同意吸收张云逸为同盟会会员。

一天晚上，张云逸和郑乃言来到一间闪烁着烛光的瓦房门前，敲响了房门。“啊哈，你的两位得意门生。”开门的是邓仲元。张云逸和郑乃言微微一愣，邓仲元是带高一年级的教官，喜欢开玩笑，天生一副乐天相。看着两人呆呆的样子，周远明的大手热情地伸了过来：“欢迎 欢迎！”

张云逸和郑乃言是周远明班上的优秀学员，尤其是张云逸，不仅学业成绩出类拔萃，而且忧国忧民，和少年时代的周远明有颇多相似之处。因此，周远明对这两位门生的来访感到由衷的高兴。

四人坐定，邓仲元笑道：“你们今天是来向教官请教问题的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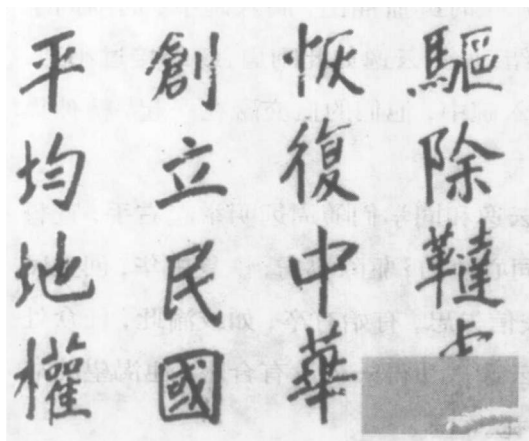
“要向老师请教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 胜之,你说是吧!”郑乃言看了一眼略显拘谨的张云逸,很明显地话中有话。

“是的,当今天下大乱,内忧外患接踵而来,国家出路究竟何在?”张云逸不由长叹一声,眉峰紧锁。

“朝廷已无希望,你们说怎么办?”周远明嗓音浑厚,

讲起话来铿锵有力。

“与其乞求,不如革命!”张云逸望着周远明说起话来热血沸腾,“周教官,今天我们来,就是为了加入



孙中山手书的同盟会革命纲领

同盟会!”

邓仲明问道:“你们不怕我去向朝廷告密?”张云逸坚定地说:“怕死就不革命了!”于是,大家相视而笑。

不久,让张云逸终生难望的这一天终于来临了。在广东陆军小学一个僻静的角落里,张云逸、郑乃言和几

位同学或坐或立，专注地倾听周远明演讲。

周远明历数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所蒙受的奇耻大辱，揭露清廷暴政，演说三民主义，讲述革命共和，介绍海内外革命志士反清斗争的情况。周远明讲毕，便是盟誓入会，为了表示死而无悔的革命精神，加入同盟会填写志愿书时要歃血为盟。张云逸第一个拿起小刀在手指肚上猛然一划，顿时鲜血涌出，滴入碗中，周围同学开始尚有畏惧情绪，见张云逸如此刚勇，纷纷接过小刀，将自己的鲜血滴入碗中，他们的血交融在一起，精神集中到一起。

紧接着，张云逸和同学们随周远明举起右手，宣誓道：“当天发誓，同心协力，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这一天，张云逸激动得一夜没有合眼，他渴望的战斗和血与火的洗礼。

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广州起义

1910年2月12日,孙中山领导了广州新军起义。起义人员在同盟会员倪映典率领下进攻省城广州,血气方刚的张云逸随着数百名新军士兵高呼“愿为革命战死”

的口号,攻向讲武堂。面对强敌,张云逸和他的新军战友们,没有退缩,他们在倪映典的率领下,反复与清军争夺有利地形,战斗十分激烈,起义军伤亡数人。

由于敌众我寡,起义军又孤立无援,经过两天两夜的孤军奋战,倪映典战死,起义遭到了失



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死难烈士之墓

败，张云逸等人怀着悲恨交加的心情撤离了战场。

1911年4月27日，革命党人在广州又发动了第10次武装起义！

这就是著名的黄花岗起义。是日凌晨，不屈不挠的反清志士们再度揭竿而起，突然向总督府发起猛烈的攻击。

这支攻击队伍，其实是800名“选锋”中的一部分。由于计划不周，又缺乏坚强而统一的领导，致使起事的时间一改再改，已经赶到羊城的几百名“选锋”又有一些退回香港去了。混乱之间，敌方已然有所察觉了，起义的领导人之一黄兴，此时也只得率领这支队伍仓促上阵了。

攻击是从下午5时半开始的。起义军敢死队首当其冲，他们臂缠白巾，手执枪械和炸弹，只待蓦然一声号炮响过，这些硬汉子便狂吼一声赤膊上阵了。他们挺进成一个箭头形状的梯队，穿过一片硝烟弥漫的广场向前逼进。

冲在前头的是黄兴，张云逸和新军弟兄们紧随其后。

阴森而庞大的总督府，成了封建王朝的一种象征。张云逸就这样，跟着黄兴向反动势力开战了，在舍生忘

死的厮杀中，他手中的大砍刀闪电般划出一道道耀眼的弧光。他跟着黄兴率领的敢死队怒吼着，迎着总督府门前黑森森的炮口进逼着。

“轰！”大炮响了。一股黑红的火焰从炮口喷出，铁砂弹片在空中划出一阵骇人的尖啸声，有几个敢死队员应声倒下去，队形乱了一下，又迅速恢复了原状。

黄兴和他的敢死队又是一声狂吼，又是擂鼓般一跺脚，这场面，与其说是一场武力搏斗，不如说是一场殊死的精神较量。张云逸后来说，他当时激奋得浑身颤抖起来，真恨不能一下子跳到黄兴的身边，纵使以身殉国又有何痛哉！

“轰！”总督府门前的大炮又响了。

再度恢复了箭头形状的敢死队已经逼近了，清兵惊惶了，清兵溃乱了，清兵丢弃了炮位，退回总督府的大门。

张云逸的大刀，随着他的大吼划出又一道闪电，又一个顽抗的清兵头颅滚下来。他，本不是‘选锋’中的敢死队员，却硬是跟着这支敢死队冲上去了。

喊杀声大作。

随着一阵鬼哭狼嚎，总督府大墙轰然倒塌了。

张云逸不是敢死队员，然而他紧跟着敢死队冲上去

了。被炮火轰倒的大墙，压住了与他格斗的清兵。这个清兵趴在他身上，嘴里喷出一股发腥的鲜血，接着浑身抽搐了一阵就不动了。

敢死队杀入总督府深处之后，有人扒开残砖碎瓦拖开已经死去的清兵，将快要窒息的张云逸救出来。这场大厮杀还没有结束，救他的战友便又匆匆赶上前去了。留下他，跟刚才被甩在旁边的这个清兵躺在一起，他缓过气来睁开眼，才发现这个清兵不过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大孩子。此刻，这个大孩子的双眼还睁着，已经凝固了惊恐的神色和求

生的渴望。张云逸心里有点诧异，这小子怎么这样嫩呀，刀没砍上炮没炸着，就让大墙这么轻轻一拍——完了。瞧他的土布内衣，瞧他的补丁摞补丁的长袜子，都证明他是一个穷人家的子弟啊。



起义领导人黄兴

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禁不住泛着苦味从他的心底涌上来。他坐在地上大喘几口气，又悲怜地从头到脚打量一下这个孩子兵的尸体，看着那张沾满鲜血和泥土的瘦脸，他难受得直想呕吐。

杀声又起，他急忙拣起身边的大砍刀，跳起身奔向前去……

激战间歇，他也不知为什么竟回到那个孩子兵尸体旁，并且下意识地伸出双手撕下一块衣襟，将这张稚气犹存的满是血污的脸擦干净了。几个新军弟兄站在不远处，十分惊讶地瞧着他的举动。

哦，这就是张云逸！

“穷苦人总是统治者的殉葬品。”张云逸从此悟出了这个道理，他感到自己的五脏六腑都热辣辣地发痛，一种压抑不住的仇恨猛地升腾起来。

起义军冲进总督衙门，却没有抓到一个高级官员。这时候，总督张鸣岐已经逃往水师行台，当张云逸提着大砍刀四处搜寻他的时候，他正和水师提督李准一起部署军队，来围攻起义的队伍。

总督府被大火烧成了废墟。但是，起义军却陷入了困境，不久，激烈的巷战就开始了。

此时，这支起义的队伍已经成了哀兵疲旅，被越来越

越多的敌军团团围困住了。黄兴的敢死队员所剩无几，大多数都战死了，终于，他们被逼到一个狭小的街道口，再也没有退路了。

浑身是血的张云逸环顾四周，不见一个援兵的影子。

他哪里知道，陈炯明、姚雨平等人率领的几支“选锋”，其实就在不远处袖手旁观。而赵声部下的 150 人，其中大多数还在香港，他们要救助黄兴也来不及了，这就是组织不力、人心不齐造成的恶果。

眼睁睁看着敌人蜂拥而至，黄兴只好将他手下的人马分为三路，力图冲出城外与新军和巡防营中预定起义的队伍会合。

下了命令，黄兴便擎刀大吼一声：“拼了！”

一阵混战之后，张云逸被逼入一条小巷，前后都被清兵堵住了，一个清兵大叫着：“你跑不了啦！”

谁陷入这种首尾不能相顾的地步，都不能不心慌。张云逸急中生智，躲到墙边的一棵大树后面，利用这棵树来抵抗身后杀来的敌人。这时，眼前的敌人猛地扎来一枪，他急忙一闪身躲开，枪尖一下子扎进大树里。趁着敌人拔枪的时机，他一步跳过去手起刀落，那家伙连叫一声也来不及就倒下去了。这个动作太快了，快得简

直让人难以想像。他竟然在砍倒眼前这一个之后，还能来得及对付另一个的袭击。转瞬间，他身后的枪尖已经带着风声扎过来，而他就在这一刹那间闪身甩手，一刀磕飞了那杆枪，紧接着他又就地打了一个急旋子，一下子踢倒了这个敌人，赶上一步又是一刀，砍在那只扬起来的臂膀上。那清兵疼得“嗷——”一声惨叫，便滚到一边去了。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墓

小巷口，又有几个清兵咋咋呼呼地杀过来。这棵大树，就在万分危急的时刻帮了张云逸的忙。眼见得进退无路，他随即“噌噌噌”几下子爬上树，再越上高墙，纵身跳入一家宅院，又遁入一个小门。跑进又一个曲折的小巷时，他回头向身后看了看，一个追兵也没有了。

在这场浴血厮杀中，张云逸是下定了舍身成仁的决

心的。他自己也想不到，这曲里拐弯的巷战和那棵大树给了他一个脱身的时机。

分别突围出来的还有几十个弟兄，有的后来又被清政府逮住杀害了。这些死难者中，有旧垒中的进步教官，有与他同窗的学友，有跟他不相识的战士，也有归国的华侨，年龄最小的 18 岁。

在被俘者中表现最为出色的，当数曾在东洋留学的林觉民、喻培伦等人。有清朝官方留下的审讯录为证，可见他们的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他们不幸被杀害了。72 位烈士，事后被人们合葬于黄花岗，实际上牺牲者还不止这些。

这次极其悲壮的起义，被孙中山先生称为“吾党第十次之失败”，就这样牢记于张云逸心中，永存于青史了。

炸弹队长

起义失败了，但革命者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激励着张云逸去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

1911年夏，张云逸与广东陆小的几位同伴站在甲板上，挥动着双手，向岸上的赵士槐、周远明等几位教官告别，他们将秘密前往香港，准备投身到辛亥革命新的战斗中去。

不久，武昌起义，并得到了全国其他各省响应。

就在武昌起义胜利的12天之后，湖南、陕西两省的省会又爆发了起义。火速波及的自然有不甘驯顺的五羊城，乃至广东省。两周之后，化州民众揭竿而起；同月29日，惠州义旗迎风漫卷，旄头直指汕头又向潮州……

在香港，在一间气氛热烈而紧张的会议室里，有十几个人正在秘密地举行一次重要会议。他们都非常激动，即便是性格沉稳的张云逸，此时也亢奋得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了。

上次起义失败之后，羊城依然沉浸在血雨腥风之

中，清王朝的鹰犬们到处搜捕和杀害革命党人。为了保存自己，再度崛起，张云逸和军校的几位同学，在一个清晨悄然登上驶往香港的海轮。当他立在岸上，赵士槐和周远明的身影在迷茫的烟雨中变得越来越遥远的时候，张云逸的心底禁不住涌上一阵酸楚，眼睛也潮湿了。他暗暗对自己说：“胜之，不要这样啊，什么事你都要挺得住！”

虽说此次秘密赴港是一次逃亡，但也是化被动为主动的得力举措。张云逸等人下一步

的主要任务，就是召集和培训一批辛亥革命的骨干分

子，让他们既懂得战略又擅用战术，以便在以后的武装斗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当时，南方支部的负责人是胡汉民。胡汉民告诉大家，驻广州的清兵几乎倾巢而出，去



剿杀化州、惠州等地的起义军，这句话，一下子引爆了整个会场——

“我们快赶回广州去吧！”

“对啊，这样才能牵制住敌人。”

“响应武昌起义，就该占领羊城要地呀！”

十几张嘴几乎同时喊起来。19岁的张云逸，素来比同龄人要冷静一些，然而他毕竟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一旦感情冲动起来却也性如烈火。此刻就是这样，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使他们激奋异常了，他一拳砸在桌面上，大声对胡汉民说：“对，拿下广州方为上策！”

胡汉民沉吟片刻，才说：“虽说广州城不是虎踞龙盘，却也有两广总督张鸣岐统兵固守。”

一句话，使热烈的气氛变得沉闷了。

“可是，不这样又怎样？”张云逸不由得锁紧了双眉，他苦苦思忖着，却又想不出更好的法子。末了，他站起来果决地说：“让我当炸弹队长吧，只要能攻下广州城，我不怕粉身碎骨！”

“好！”胡汉民脱口叫道。

又一个中等身材、肤色黎黑的小伙子站起来，紧跟着说：“让我跟胜之一起干吧，我也愿以死殉国！”

“好！”胡汉民也跳起来了。

张云逸一步上前，紧握住愿意跟自己干的这个小伙子的双手，双方一时默默无言，彼此心照不宣，不必再说什么了。这个跟他并肩战斗的小伙子，后来成了国民革命军海军第四舰队司令官、广州市长，他的名字叫陈策。

会场的气氛再度转为热烈，一个会攻广州城的行动计划就在酝酿之中。

是年11月初，会攻广州的各路人马，纷纷从四面八方方向城郊汇集，准备展开一场你死我活的攻坚战。首当其冲的开路先锋，自然是张云逸、陈策和他们的炸弹队。好家伙！一队铁骨铮铮的硬汉子，一个个臂下紧夹着小行李似的炸药包，义无反顾地雄赳赳大步挺进。

炸弹队没有一门炮和一发炮弹，有的只是几十条血肉之躯和默默无言的炸药包。准确地说，这是一支爆破队。

在淫雨霏霏的一天下午，广州城已经遥遥在望了。走着，走着，便有拦路的鹿砦和堑壕迎过来。在堑壕那边的工事上架着两门炮，犹如两只虎视眈眈地蹲伏着的独眼怪兽。

那时候的土炮笨重极了，射程也不远。“轰！”一家伙喷出一片铁砂碎石，倒也有相当大的杀伤力。一个炸

弹队员躲闪不及，顿时被铁炮轰了个满脸花，副队长陈策火了，夹起炸药包大骂道：“兔崽子，你们等着！”不料跳起来时，却被一只手紧紧拉住了，是队长张云逸。

队长的声音异常严厉：“趴下，都趴下！”

弹雨之下，隐蔽在沟里或树下的炸弹队员们，都憋着一口气等待着。

“队长，让我冲上去吧！”按捺不住的陈策大叫。

“急什么，让他们轰一阵子。”张云逸拽住他，继续冷静地观察着。

土炮又轰响了几下，便嘶哑了。张云逸笑了笑，说：“炮筒子太热，射不远了，让它打吧，放屁一样。”

陈策钦佩地说：“队长，你可真行。”说着，脱下军衣裸着上身，将成排的肋巴骨露出来，他就要夹起炸药包冲上去了。

“再等一下，”张云逸不慌不忙。在炮火的轰击中，他抖了抖落在身上的砂土，又问陈策：“咦，你的小马甲呢？”

那件小马甲极漂亮，家织的土布，胸前绣着两朵花，花是心状的蕾，粉嘟嘟至顶尖便是鲜红的了。他曾在一个晚上问陈策：“这马甲，是谁的手艺呀？”陈策的脸便红了。他愣了一会儿，突然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才19岁，

对爱情犹如雾里看花，陈策有个细妹子，他没有。他十分喜爱这件小马甲，可他没有；他十分羡慕那两朵贴着胸口的花蕾，可他也没有。

没有小马甲和绣花的张云逸，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陈策又红了脸，趴在他耳边说：“队长，小马甲在我的背包里，万一我……请你把它邮回去，还给她。”

说到这儿，他发现队长的嘴角抽搐了一下。

是的，张云逸的心太软，一辈子，他也没改得了慈悲心肠。他揉了揉眼睛，一下子夺过陈策的炸药包。

“干什么 你！”陈策脱口叫道。

这时，对面的土炮仍在有气无力地嘶叫。

“现在还轮不到你。”张云逸说着夹起炸药包。

陈策还要争夺，张云逸恼了：“我让你等着，这是命令。”说罢，单腿跪在大树后迅速观察一下，猛然间跳起来冲上前。

“快掩护！”陈策大叫。

这时，敌人的枪炮声已经响成一片。

陈策后来想起这生死攸关的时刻，他一只手还下意识地往前一抓。他说他当时是想抓住张云逸的胳膊，周为他发现前方碉堡上突然亮出几个枪眼，随即就喷出一

条条炽烈的火舌来。然而，哪里还能抓得住呢，张云逸已经蹿出去几步了，就这样闪电般奔跑着。突然，他一个跟头跌倒了，就地打了个滚，陈策的心像是被什么揪扯了一下，不禁大叫道：“队长！”

他以为张云逸中弹了，他夹起另一个炸药包正要接着冲上去，却又发现张云逸以极快的速度匍匐向前，转眼之间就爬到敌人射界的死角去了。原来，队长是佯作中弹，转移敌人的注意力。陈策这才轻轻嘘了一口气，揩了一把脸上的冷汗，回头大喊道：“开火，狠狠打！”

有几个初上战场的小伙子都看愣了，听陈策这么一喊，才回过神儿来冲着碉堡一顿乱射。这仗，打得真不怎么样，陈策后来说，胜之这是拣了一条命，爆破的人上去了，而担任掩护的人却忘了开火！

不管怎么样，清军的这个碉堡是让张云逸给端了。只听轰然一声巨响，碉堡犹如一顶偌大而丑陋的破帽子，被腾起的一股烟云冲上了天。断枪残肢，血肉砂石，乱纷纷地抛出来，奇怪的是，在那个炸出的大坑里，竟然还有一个蜘蛛似的怪物蠕蠕拱动着，是一个什么家伙呢？

工事旁边，剩下的铁炮在炸响——的确是炸响，大概是火药装得过多，它炸膛了。没有被炸死的清兵爬出

掩体，屁滚尿流地逃命去了，谁，又肯死心塌地为该死的清王朝卖命呢。

陈策带着队伍呐喊着冲上去，只抓住几个受伤的兵丁。大坑里那个蠕动着怪物，被张云逸一只手拎起来，只见他一脸的血污和泥水，原来也是一个清兵，这真是天大的怪事，他怎么没有被炸死？

这个怪事还有一个尾巴：几个小时后，他竟然心甘情愿地接受了张云逸的政治主张，带着臂上的轻伤跟大家去攻打广州城了。

兵临城下，枪炮齐鸣，羊城摇摇欲坠。

两广总督张鸣岐吓坏了，面对与他谈判的革命党代表不知所措，他用一只颤抖的手连连揩抹自己胖脸上的冷汗，终于低声下气地接受了对方提出的条件。他说：“我同意，两广脱离清政府……独立。”

各地起义军进驻城内，随即，广东革命军政府宣告成立了。

消息很快传往四面八方，各地的革命斗争更是如火如荼，清王朝的垮台已然是大势所趋，无可挽回了。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湖南、陕西、云南等十多个省都脱离了清王朝的统治，纷纷宣告“独立自治”。

寻找光明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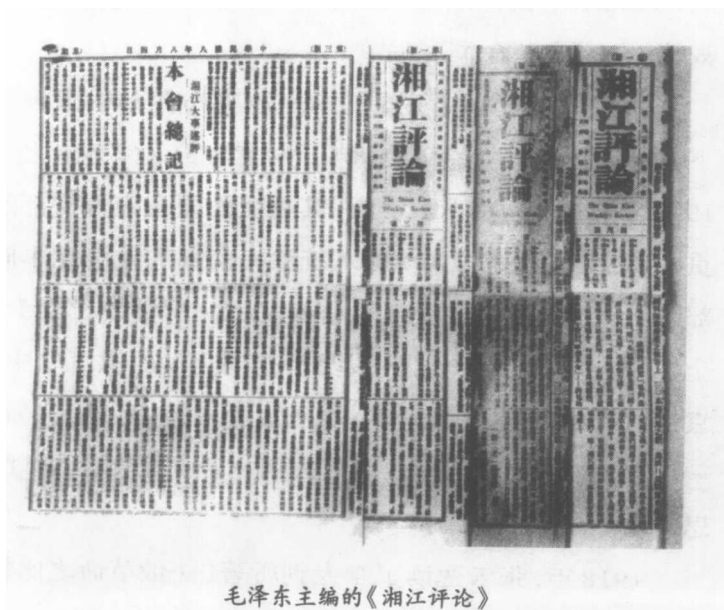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然而，中华民国宣告成立的同时，失败的危机也开始孕育了。正当张云逸由革命政府保送入广东陆军速成中学学习时、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不久，又刺杀宋教仁镇压二次革命，取消国民党，实行独裁统治，辛亥革命彻底失败。

张云逸从迷惘中猛醒过来，他决心在孙中山领导下，重新举起民主革命的旗帜，对袁世凯“誓必除之”。1914年，张云逸完成了学业，其后受同盟会南方支部的重托，冒着杀头的危险，打入统治海南岛的龙济光军阀部队从事反袁斗争。护国战争爆发后，他又同“三合会”全体成员带领自己的部队投身于护国运动的洪流之中。袁世凯死了，军阀割据和纷争开始了，护法运动是昙花一现，旋即流产。革命之路何去何从，张云逸陷入了沉思之中。

1918年，张云逸读了李大钊所著《法俄革命之比较

观》后，心中再次燃起了希望之火，他开始拼命阅读革命书籍，《湘江评论》、《少年中国》使他爱不释手。有一天，张云逸拿起《湘江评论》，对人说：“毛泽东的文章写得很有水平，你看‘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民众大联合的胜利；中国人民应当仿效俄国的革命方法，实行中国人民的联合。’古有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毛泽东讲的道理很深刻哇！”

张云逸决定去做那覆舟之水。1921年，他告别海南



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

岛，搭乘海轮到达广州，到粤军陈炯明部任营长，正是这一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点燃了中国革命的希望之火。

但是，革命之路何其多艰！1922年，粤军第二师师长，革命者邓铿被杀，陈炯明叛变，炮轰‘永丰’舰。8月9日，孙中山孤军无援，不得不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国民党的革命中心——广州再度陷入黑暗之中。

“孙中山致力于革命几十年，为何每到关键时刻，革命形势总是就急转直下？我们推翻一个皇帝，马上就出来一个更专制的皇帝；我们打倒一个军阀，起来的是一个更残酷的军阀。‘民族、民权、民生’是如此鼓舞人心，可为什么一到现实中就这样的不堪一击？！”张云逸陷入沉思，他逐渐意识到孙中山走的革命道路存在着一些问题，依靠一个军阀去打倒另一个军阀，结果出现的只能是一个更大更强的军阀。国民革命如果依靠军阀部队进行，永难成功。而在军阀控制的军队里，张云逸感到自己只不过是军阀纷争的工具而已，革命的理想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而已。

于是，张云逸在1923年毅然离开了军队，进入广东国民政府行列，出任揭阳县县长。他以极大的努力实施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纲领，革新除旧，力图给百姓带来

“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在他的官邸中堂挂上一幅青菜图，旁书“为民父母不可不知此味，为吾赤子不可令有此色”，以时刻警醒自己为民作主。此刻，他正坐在太师椅上，一言不发。

“张县长，昨天行署李专员走时很不高兴，您应该送以重礼。”主管全县财政的钱英提起了话由。“是吗？！”张云逸心中不禁对那个骨瘦如柴却贪得无厌的专员心生厌憎。

钱英凑过来小声说道：“现在送礼之风盛行，凡有官员过往，哪个地方官不利用公款大肆宴请，重礼接送。昨天李专员来县里，您的接待实在有点看不过去，反正钱又不是自己的，您何不花得大方一点，皆大欢喜嘛！”

“中山先生倡导三民主义，我们当以民生为重哇！现在民间困苦日甚一日，我哪能拿了百姓的钱大肆挥霍，以图私利？”张云逸正言说道，令钱英一时无言以对。

一阵短暂的沉寂之后，钱英想起了什么事，说道：“县城西部交通要道，约有50里路面年久失修严重毁坏，您看是不是加收点赋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把道路修好？”

“这段路是该好好修复修复了，但增收赋税，又要加重百姓负担，县里这段时间省下来的公费开支不少，你

看够不够修路用的？张云逸问。“够是够了，可是……”钱英话未说完，张云逸便道：“够就行了，不要再多说了，就用这笔钱来修路好了。”钱英碰了一鼻子灰，讪讪地走了。

这时，好友阿明从院子里走进来。“先生，钱英白天拿来一笔钱，说是作为县长开支的例金，说是县里大小官员都有，只是多少不同，他一定让我替你收下，钱都在这里。”阿明边说边从口袋里拿出一包银元来。

“你怎么如此糊涂？！百姓生活这般困苦，而我的薪俸已够丰厚，哪能再收什么例金。钱英送了几次，我都没要，你倒好，替我照收不误！”张云逸非常生气地说：“阿明，你明天一早就把钱送回去，我不仅不收，还要把这例金习俗革除！”事后，钱英背地里恨得直咬牙。

是年揭阳大旱，饥民盈野，张云逸看到运来的救济粮，问钱英：“往常怎么做的？”按惯例，救济粮全部以平价出售，再将其收入上缴即可。”钱英小心翼翼地回答：“饥民有钱买粮吗？”张云逸心存疑虑。“这个……”钱英支支吾吾，他从来不管这档子事，只要有钱就成。“混帐，现在大旱，真正的饥民哪里有钱买粮，而有钱的豪民富户定会乘机抢购囤积，再来倒买，今年我们要变一变，救济粮部分以市价出售。市价远高于平价，只需

出售小部分粮食，收入即能抵还上司；其余的大部分粮食，我们要在县府门前广施粥厂，以救济饥民。’张云逸拍板了。次日，县府门前挤满了饥饿无比的灾民，张云逸亲自施粥，饥民们一边喝着热粥，一边感叹：“青天青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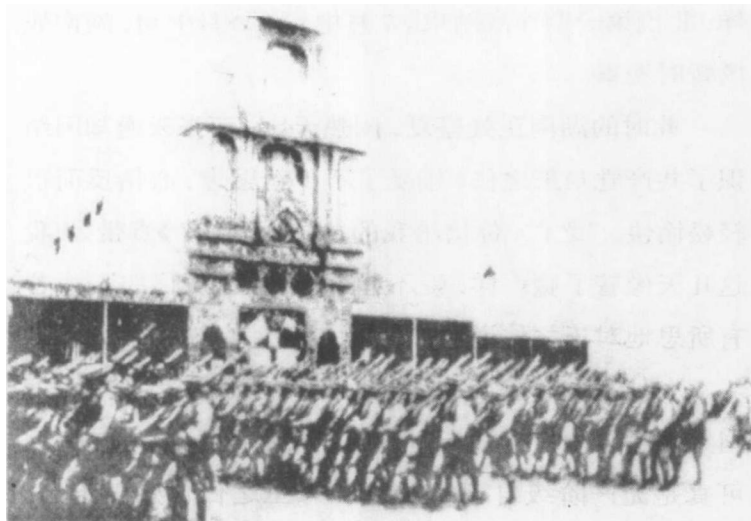
然而“青天”张云逸却招来了恶势力的报复。先是奸商联名状告他将平价粮以市价出售，中饱私囊。接着又有人告发他擅自减少赋税，导致县府机构运行困难。还有人说他独断专行，不知体恤下情，使县里官民怨声载道，恳请将其撤职。这下子，地区行署的李专员借题发挥，串通其他官员，一致决议对张云逸“劝其离职”。

黑暗的现实使人猛醒，张云逸愤然离职回广州，投入到了粤军许崇智部下，重披军装，先后参与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和东征陈炯明。

北伐师参谋长

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7月3日,国民政府成立了军事委员会,不久,军事委员会宣布所属各军一律改称国民革命军。

8月1日,张云逸收到建国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发出的通告,宣布根据国民党的新政策,辞掉粤军总司令职



1925年8月,国民革命军成立时在广州举行阅兵典礼

务，军队交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控制。8月26日，张云逸所在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这就是在以后的北伐战争中令敌人闻风丧胆、在群众中享有美誉的“铁军”！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先进军湖南、湖北打军阀吴佩孚，由北伐军第四、第七、第八3个军担任两湖战场的正面主攻。同时派出部分兵力，分别警戒江西、福建之敌。张云逸所在的张发奎部由第四军独立旅改为第四军第12师，由张云逸任师参谋长，该部参加了这次战斗，北伐军势如破竹，很快进驻长沙，这样，北伐第一期作战结束。7月中旬至8月中旬，湖南战场暂时无事。

此时的湖南正处盛夏，闷热无比，而张云逸却因结识了共产党员王之仁，接受了不少新思想，心情反而很轻松愉快。“王之仁，你借给我的《共产党宣言》真带劲！我这几天像着了魔一样，爱不释手，百看不厌！”张云逸若有所思地对王之仁说。

“是呀，这个宣言自发表以来，在欧洲广为传播，俄国人便是以此为精神指引搞了十月革命，一举成功，这可真是无产阶级自己的学说呀。”王之仁也感慨不已。

“共产主义真正表达了人们的社会理想，反映了社会发

展的客观规律。它不仅在落后的俄国取得胜利，而且在古老的中国也一定会获得成功！王之仁眼中放射出希冀的光芒。

“我也越来越深切地感到了它旺盛的生命力，感到了它势不可挡的力量！”张云逸颇为激动，“从东征到北伐，凡是有共产党员的地方，就没有摧不垮的工事、攻不破的防线。我过去曾苦苦追随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但却处处碰壁……”胜之，那你知道为什么碰壁吗？王之仁问道。“为什么？”张云逸一直想知道其中原由，急不可待地追问。王之仁语重心长地说：“‘三民主义’虽好，但它真正代表的却是中国资产阶级，仍不能解决中国最广大老百姓的实际生活问题。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而社会进步的决定力量是最广大的人民。因此，谁取得了民心，谁就可以取得革命的胜利！”这一番意味深长的话语令张云逸陷入了沉思。

不久，北伐军第四军兵锋直指平江，仅一天时间就攻克了平江，并且击毙敌军主将陆，俘敌官兵 1500 余人，缴获大炮 11 门，机枪 5 挺，长短枪 200 余支，北伐军获得重大胜利。

张云逸心中清楚，这胜利的果实都离不开工农群众的大力支持。在共产党领导下，平江工农建立了暗探

队、向导队和运输队以配合北伐军。战役前，他们为北伐军提供军事情报，战役中，又为北伐军运送物资、清除障碍，仅农民武装就杀敌 200 余人，但为此农民兄弟也付出了巨大牺牲。想到这些，张云逸不由得对共产党心生敬佩与向往。

8 月底，昼夜兼程的北伐军先头部队，迎着萧瑟的秋风一路烟尘继续北上。终于，武昌城遥遥在望，骑在黑马上的张云逸，举起了望远镜



江城武汉，三镇一体，实乃兵家必争之要地。武昌城池，墙高壕深，重兵重炮，固若金汤。且抱有蛇山，临长江而北望龟山，以成相互策应之势；且濒临浩瀚之东湖，南去便是洪山。在蛇山、龟山、琴台等地，都构筑了炮兵阵地，形成纵横交错的火网。各交通要道，都有重

兵坚守，且设下层层电网、雷区……

北伐军第四军和第七军开始做攻城做准备。

张云逸、叶挺等人坚决主张：一鼓作气攻下武昌城池，决不给敌军以喘息之机。张发奎呢，自然也愿意拿下这个头功来，尽管他的一师人马损失惨重，这炙手可热的战果他又岂能放弃？于是，他大声对张云逸说：“参谋长，赶快向前敌总指挥部请战！”

张云逸立即摇动了电话机。

北伐军一路风风雨雨，一路刀光剑影，从广州苦苦杀到了武昌城下，哪一个愿意就此罢手？穷寇勿追，功亏一篑，那是前人留下的沉痛教训啊。

唐生智在电话中说：“好，你们要枕戈待旦，准备攻取武昌城。”

放下电话，张云逸、叶挺等人都摩拳擦掌，只待前敌总指挥唐生智一声令下，他们即刻便会挥师攻城了。

然而，整整两天的时间过去了，求战心切的将士们竟没有等到进攻的命令。眼看着敌军在那里匆匆忙忙地增加碉堡，深挖堑壕，构筑炮阵地，这怎能不令人心急如焚！

9月2日那天晚上，张云逸和叶挺实在按捺不住心头的火气，闯入师长张发奎下榻处大声质问：为什么给

敌人喘息之机？上头到底安的什么心？

张发奎的脸扭曲成一个苦瓜，他说你们问我，我问谁去。说着，将桌上的电话机往前一推：“要问，你们问吧。”

张云逸摇通前敌总指挥部的电话，唐生智的声音显得那么遥远而又陌生：“这个……部队长途征战，疲惫至极，休整几日，以利再战嘛。你老张急什么，头功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

张云逸又大声问：“总指挥，我问你什么时候发动进攻！”



1926年8月，叶挺独立团在突破汀泗桥后收缴敌人的武器

对方没有回答就挂上了电话。

这边的几个人不由得面面相觑，叶挺分析道：“我看，这老唐是不愿意让我们第四军抢先拿下武昌。”

一句话，提醒了其他人，第四军，隶属于蒋介石麾下。原来，他是怕老蒋抢了他的地盘，没办法，国民党的权贵们就是这样。

北伐军的先锋部队苦苦等待攻城的命令，一直熬到9月3日凌晨3时。

“轰——！”一记重炮，在武昌城头爆炸了，这无疑进攻的号炮，霎时间，枪炮齐鸣，硝烟四起，北伐军犹如滚滚的怒潮涌向前去。那不可遏止的浪头，便是张云逸所在的部队，便是叶挺的铁军。

炮群在轰击，武昌城颤动着。

透过一团团蘑菇状的烟云，可望见那三丈多高的城墙被炸开了一道豁口。北伐军呐喊着冲过去，不料，一道深深的堑壕横在他们脚下，这道水壕，原本没有这么宽这么深，由于进攻的时间推迟了两天，敌人便有了挖壕的机会。士兵们冲到这道水壕边，跳又跳不过去，退也退不回来，惯性的力量使后边的人收不住脚，只听得“扑通、扑通、扑通……”一阵落水的声音，前边的那些人都掉进堑壕里去了。后边的人群继续冲过来，转眼间

这又宽又深的堑壕就填满了人。

“哒哒哒哒……”敌人的几十挺机枪发了疯一般扫射，子弹犹如一群飞蝗遮天蔽日地扑来。可怜北伐军的勇士们，就这样在冲锋的过程中倒下去倒下去。

激战进行3个多小时，武昌城下已经堆满了横倒竖卧的尸体，那道护城堑壕里的水也被鲜血染成了殷红色。敌人的机枪仍在狂叫，手榴弹从城上不断扔下来，把城墙上那道豁口牢牢地封住了。张云逸亲临前沿阵地指挥攻城，仍不能奏效，敌人的火力太强，防御也太坚固了。

第一次攻城，以北伐军的重大伤亡而告失利。

次日，担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亲临前线，在南湖召开团以上军官参加的作战会议。会上，军装笔挺、仪表威严的蒋总司令坐在长长的桌案上端，用一种不温不火的目光扫了一下在座的军官们。他发现桌案的另一端，在第12师师长张发奎的身后，默默地坐着叶挺和张云逸，便显出十分亲热的神情。

“哦，那不是希夷和胜之吗？来，坐到我跟前来嘛。”

站在墙边的卫兵听了，也不管这俩人是否愿意，就走过来搬起椅子放到总司令的身边去了，叶挺和张云逸只好过去坐下。

蒋介石的记忆力非常好,只要是他注意的人,特别是他器重的人,他见上一面就能记得牢牢的。在场的军官们没有不知道的,由于叶挺率领他的铁军在汀泗桥之战中功绩斐然,这位蒋总司令当众宣布:叶挺上校直接晋升为少将,这种殊荣,在国民党军官中实为罕见。此外,他器重的便是张云逸,他知道张发奎连战连捷主要靠的是谁,然而,这两个人都不主动靠近他,真让他心中不快。如果他有未卜先知的手段,预测出叶挺和张云逸后来都跟了共产党,那么,他一定先下手以绝后患,

哪怕这时候是忍痛割爱呢。

他似有意又无意地问叶挺:“希夷呀,这个,武昌城如此难破,嗯。”

叶挺直言不讳:“总司令,这是因为我们没有抓住战机。”

“胜之,你意如何?”蒋介石又问。



叶挺

“希夷兄说的不错。”张云逸毫不客气,谁的脸色也不看。这种憨厚耿直使他时常吃亏,他自己也知道。他甚至猜得出话出口会招致什么后果,然而该说的时候他还是直言不讳。他又说:“北伐战争,不是军阀割据,不能容忍那种不顾大局的私欲。”

这句话,第二天就传到唐生智的耳朵去了。实际上,张云逸既不想惹恼谁,也不想取悦于谁,他完全为的是北伐大业。蒋介石听了,嘴角微微一笑,做出相当宽容大度的样子,总司令自有总司令的气派,日甚一日的便是颐指气使一意孤行。他让在座的各位将领谈兵论战,与其说是要征求他们的意见,不如说是要瞧瞧每个人的胆魄和才能。听得不耐烦了,他便以不容置疑的口气断言道:“这个,我命令,最多两个昼夜夺取武昌城!”

说罢,起身拂袖而去。

9月5日,是北伐军进攻武昌城的第三天。这天凌晨3时许,雾气笼罩着江城,龟蛇二山仿佛沉浸在一片茫茫秋水之中。这时,第12师早已奉命分兵出发,在茫茫晓雾之中悄然赶赴邓家湾。

这邓家湾,与武昌城相距大约一公里,是一个既可隐蔽又可出击的去处,几路人马匆匆集合在此。参谋长

张云逸骑着他的大黑马，站在师长张发奎的身边，目光忧郁地一言不发，眼前这个阵容看起来比以往小了许多，也弱了许多。唉，有许多熟悉的士兵，如今都见不到了，永远也见不到了。张云逸的心里十分难受，有一种悲壮的情绪向上升腾。劳师疲旅，血阵哀兵，却仍要死拼上去，看来这一仗真的要豁出老本去了，想到这儿，他的脸色变得十分冷峻。

各路人马都到齐了，都做好了厮杀的准备，师长张发奎简单动员了几句，然后说：“请参谋长讲话。”

这已经成为一种惯例，几乎是每次作战之前都由张云逸布置具体任务，张发奎这个师长当得倒也潇洒。只听张云逸用果决的声音说道：

“独立团务必突破宾阳门，第 36 团务必突破通湘门……各团的敢死队，马上出发 记住，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牺牲。”

夜色未尽，炮声隆隆，又一场殊死的争夺战开始了。

在炮火的掩护下，叶挺将军指挥独立团的敢死队，抢先越过护城的堑壕，疾风一般向宾阳门冲去。双方的枪弹交织成一片火网；双方投掷的手榴弹炸起一团团烟尘，激战之中，这些敢死队员全部壮烈牺牲了。

与此同时，第 36 团敢死队正在攻打通湘门，他们也

已经伤亡过半了。

这时候,张云逸正在前沿观察所指挥战斗。炮弹撕裂了空气发出刺耳的呼啸声,在远远近近的地方轰然爆炸。那些英勇的敢死队员,一批倒下来,又一批冲上去……

几年之后,叶挺将军回忆这场战斗时说 我从火线匆匆赶到师指挥所时,发现张云逸正站在一盏吊灯下面,一只手抓着电话机,另一只手抓着话筒拼命大喊,喊的什么,在枪炮声中听不清楚。我发现他痛苦得脸都变了形,嗓子完全嘶哑了。他问我:“希夷,你那边怎么样?我说:“我的敢死队全打光了。”他一听,眼睛就红了。他的声音哽咽着:“多好的一些小伙子 他们都有家,有父母,都年纪轻轻的,让他们活着多好!”

“又来了!”张发奎不满地扭过头去;“我的参谋长哟,你当我不心疼自己的兵?老天!我的部队打光了怎么办哪?”

“师长,不能继续攻击了。”张云逸咬紧牙关叫道。

此时,张发奎蓬头垢面双眼发红,那张铁青色的脸也定然神经质地痉挛着,他一屁股跌坐在一把破椅子上,双手揪扯着头发说:“老天爷呀 撤 撤下来,蒋总司令还不宰了你!”

“撤！谁也不能瞎指挥。”叶挺也毫不退让。

张云逸又摇起了电话。过后，他走过来大声说：“师长，天就要大亮了，我们再不撤出危险地带，就必然暴露在敌军的火力之下。”

身为一师之长的张发奎当然明白，自己的部队完全暴露在敌军火力之下，将会是多么可怕的后果。他望一望东方出现一抹曙色，咬着牙走到电话机旁，对张云逸说：“我操老子这颗脑袋不要了，给我要老蒋。”

那个破电话机，被摇得呜呜呜一个劲地叫，却听不到什么回音。张云逸赶紧派人去查线，原来是电线被炮弹炸断了，派出的两个士兵费了好大的劲，才把电线重新接上，又呜呜呜摇了一阵，这电话总算通了。

凌晨5时许，老蒋接到各路队伍的报告，没有一路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怎么办？他硬着头皮又坚持了一阵，到底无可奈何了。

“通知各部队，撤退。”6时许，这位总司令下令。

枪炮的喧闹声平息了，间或有冷枪流弹在骚扰着。好了，且让彻夜未眠的蒋总司令再沮丧一会儿吧。又过了一会儿，电话突然响起来。这位总司令拿起话筒，听着，突然与刚才判若两人，又是那么躊躇满志的样子了。

怎么回事？原来是两个好消息：一是北伐军第八军

强渡了长江，正在向汉口和汉阳发动猛烈的进攻；二是北洋乌合之众中有人反戈——刘左龙一师揭竿而起了。大帅吴佩孚于暴怒之中摔碎茶杯，喝令手下人追杀叛逆以服军心。

9月6日，洪山。

这是北伐军的又一次军事会议，参加者是各路人马中的团以上军官。会场前台正襟危坐着总司令蒋介石，据说他此时的神态是既威严而又温和的。武昌之战，是北伐军决胜与否的关键，因此，他这个总司令当然要亲自主持这次会议了。在场的军官们情绪挺好，一个个都有‘温酒斩华雄’的大丈夫气概。为何？因为就在这天上午，吴佩孚统辖之下的汉阳军一败涂地，北伐的大旗已然越过汉江在这个重镇上空飘扬起来。进攻汉口的战斗，也指日可待，待几个部下发言之后，他别有深意地引用《周易·剥封》中一言：

“小敌困之。剥，不利有攸往。”

这是什么意思？张云逸自然明白，“小敌困之”是说对虽弱小而又不能立即擒获之敌，应该采取围困的兵法；“剥，不利有攸往”，是警句，是说敌军虽然疲弱，但是在紧要关头还能死拼一番的，切不可轻敌。在历代兵家推崇的“三十六计”中，讲诱敌入城然后围而歼之的

故事,用的便是‘关门捉贼’一计。武昌之战,审时而度势,他觉得老蒋用兵虽则借用掌故,却不生搬硬套,实在地说,他感到老蒋确有老辣之处。不过,也不是没有牵强之处,现在还不能说敌军弱小。

毕竟,老蒋这几句话有些道理,无怪乎当场有人大声赞叹:“总司令高人高见,此言便是我军克敌制胜之良策啊!”这种吹捧未免有些肉麻,然而也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自古以来捧臭脚的人比比皆是。这时候,张云逸和叶挺对老蒋并没有敌意。后来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老蒋才闹了个众叛亲离,千夫所指。

在这次军事会议上,各路将领的争执不多,最后由蒋介石一锤定音:扩大汉阳的战果,即尽快夺取汉口,进而围困武昌。

9月7日,又一场激战在汉口打响。北伐军经过浴血厮杀,从汉口车站推进至武胜关,争夺战反反复复,进行得异常激烈……

炮火硝烟之中,就任城防司令的刘玉春狼狈不堪,只身从火线上退下来,又急匆匆驱车去见吴佩孚。

“大帅,汉口失陷了!”

“什么,你说什么?只见大帅头晕了似地摇晃一下,失神的双眼死死地盯着他,却半晌说不出话来。“刷一

——”大帅抽出了佩带着的指挥刀，缓缓地将它举起来……

“哇！”刘玉春立正如桩。大帅看着他，烟火满脸，血染军衣，他，并不惧死啊。他说：“大帅，杀了我又有何用，还是赶快撤退吧，你的安全要紧。”

或许是最后一句话真正起了作用，吴大帅长叹一声收起军刀，让刘玉春携扶着走到一把椅子旁边，坐下去后，他一言不发，傻了似的。这时，北伐军的枪炮声越来越近，其中一记重炮在帅府大门前炸出一个大坑，有两扇窗子的玻璃被震碎了。这一下，促使他咬紧牙关命令道：“撤退！”

曾经不可一世的北洋军大帅吴佩孚，如今无奈抛下守卫武昌的部队，灰溜溜地逃往河南郑州去了。汉口的溃兵，乱哄哄地逃往河南信阳，把武昌的弟兄们全都丢下不管了。

武昌守敌成了瓮中之鳖。

北伐军继续围困，只围得守敌军心涣散，只困得城内弹尽粮绝。北洋残兵度日如年，就这样熬了一个多月，都成了打家劫舍抢米夺面的强盗。

10月10日，北伐军总攻的时机成熟了。

随着一声炮响，张云逸、叶挺等人率领各自的队伍，

奋勇冲向武昌城下。这一场殊死的争夺战，只打得硝烟滚滚，天昏地暗，其激烈程度可想而知，终于，武昌城被攻陷了。

当国民革命军的胜利旗帜高高飘扬在武昌城头的时候，张云逸和叶挺的心情特别振奋。他们料想，1927年是北伐军决胜的一年，再有几个月的时间，就可以消灭吴佩孚、孙传芳的军队，进而占领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江苏、安徽、浙江等地，并将战果扩大到全中国。

他们的预料果然不到半年就基本实现了。然而，他



1926年10月10日北伐军占领武昌

们怎么也想不到，就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如海潮一般涌向高潮的时候，在上海竟然发生了血腥的反革命大屠杀——四一二事变！

张云逸看清蒋介石的真面目之后，对国民党及其军队也彻底失望了。就在这场腥风血雨即将来临前夕，他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

火热的斗争锤炼了一个人，而真正令张云逸惊喜和终身难忘的，却是另外一件事情。

1926年11月的一天，王之仁带着张云逸来到了一个高墙环绕的庭院，推门而入，眼前的景象令张云逸耳目一新。原来迎面的墙上端端正正挂着一面绣着镰刀斧头的红旗，像一团正在熊熊燃烧的火焰；这是中国共产党党旗！”张云逸眼睛一亮。

这时，王之仁走上前握住了他的手；胜之同志，组织上已批准你的入党，从今天起你就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一员了！”其他几位老党员



也围上来，向张云逸表示祝贺。

张云逸激动不已，眼中不禁涌出了泪花，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他在追随孙中山革命却反复失败后，痛定思痛，经过长时间的理论学习和实践斗争，逐渐形成的想法，是他心中一个强烈的愿望，当这一夙愿马上要实现时，他却兴奋地说不出话来。看着这面党旗，他半晌才哽咽地说：“谢谢同志们！”

接着，在鲜红的党旗下，张云逸随着王之仁庄重地抬起了右拳，庄严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革命征途上，又多了一位英勇无畏的斗士！

张云逸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为了便于工作，一直未暴露身份。他在北伐军中利用自己的身份，为党作了大量工作。

在南昌起义前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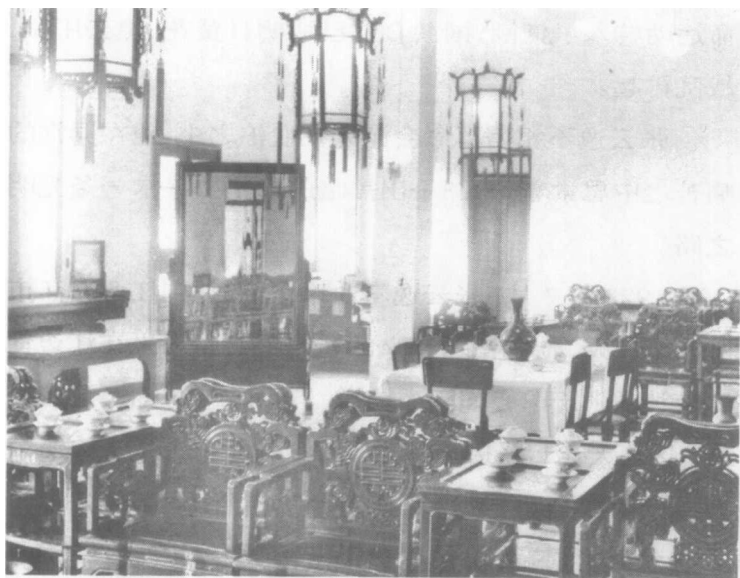
1927年4月12日，羽毛已经丰满了的一代枭雄蒋介石公然叛变了革命，丧心病狂地在中国杀害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紧接着，血雨腥风卷向全国各地，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这样失败了。从此，革命运动转入了低潮，国共合作已成明日黄花，黑云压城，战乱再起。

张云逸不相信革命会淹死在血泊之中，他在异常的痛苦之中思索着，力图杀出黑暗的旧垒去寻求一条光明之路。

1927年7月，张云逸奉命率第25师到江西九江市驻防。一天，他和南昌起义的联络员聂荣臻坐在江边促膝交谈。张云逸心如潮涌地说：“今年4月以来，形势突变，这几天，汪精卫也在武汉忙着召开‘分共’会议，公开叛变革命，而陈独秀还在大谈合作高调，甚至要求全党放弃革命领导权，他命令工人纠察队解散武装，这不是让我党坐以待毙吗？”

聂荣臻点头称是：“再这样下去，共产党就只能被斩尽杀绝了！”聂荣臻讲到这里，停了一会又话锋一转高兴地说，“好在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央及时进行了改组，陈独秀被停职，成立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并且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武装反抗反动派的大屠杀！好对凶恶的敌人只能以牙还牙，让他们也尝一尝我们的厉害。”张云逸兴奋不已。

接下来，聂荣臻分析了一下南昌起义的敌我形势，



部署南昌起义军事行动计划的旧址原江西大旅社会议大厅

并询问 25 师的近况。

张云逸信心十足地说：“师长李汉魂是个顽固的反共派，但我和周士第已牢牢掌握了 73 团、75 团三个营和 70 团重机枪连。周士第是黄埔一期毕业，1924 年的老党员，是个有勇有谋的同志。北伐中曾任营长、团参谋长和代理团长，参与指挥了攻打汀泗桥、贺胜桥，攻克武昌的战斗。你尽管放心，到时让他把队伍拉到南昌参加起义，保证万无一失！”

聂荣臻笑道：“再加上你这个师参谋长从中斡旋，到时给李汉魂来个釜底抽薪，当胸一拳，自然万无一失喽！”

8 月 1 日，南昌起义爆发。从庐山开完会回来的李汉魂神色慌张，突然通知 73 团团长、共产党员周士第到师部，以商量要事为名企图阻止他率部参加起义。周士第接到电话，从驻地马回岭骑马来到师部。张云逸已经等在那里，将形势的突变，和李汉魂的异常企图向周作了交代，嘱其提高警惕。

到了李汉魂驻地，寒暄之后，李汉魂压低了声音说道：“总指挥（指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很称赞你，打算重用你，希望你跟他走，不要跟共产党走。”说完，李汉魂满怀期望地盯着这个黄埔一期生。

周士第答道：“第四军在北伐中能打胜仗，总指挥之所有今天的地位，是因为有共产党的帮助。你们跟着汪精卫反共、分共，只有死路一条！”周士第的话掷地有声，令李汉魂一时无言以答。

“士第，你怎么这样对师长说话？师长还不是为你好去，到外面冷静一下，好好想一想。”张云逸乘机把周士第拉了出去。悄声说道：“你速回团部参加起义，这边我来应付。”在张云逸的秘密掩护下，周士第随即快马加鞭奔回团部，与在那里等待多时的聂荣臻以打野外为名将队伍拉出驻地。

当73团走到德安车站以北时，张发奎、李汉魂率卫队营乘火车追来。起义部队给以猛烈射击，张发奎、李汉魂仓皇跳车，狼狈而逃，火车上的卫队营则被起义部队包围缴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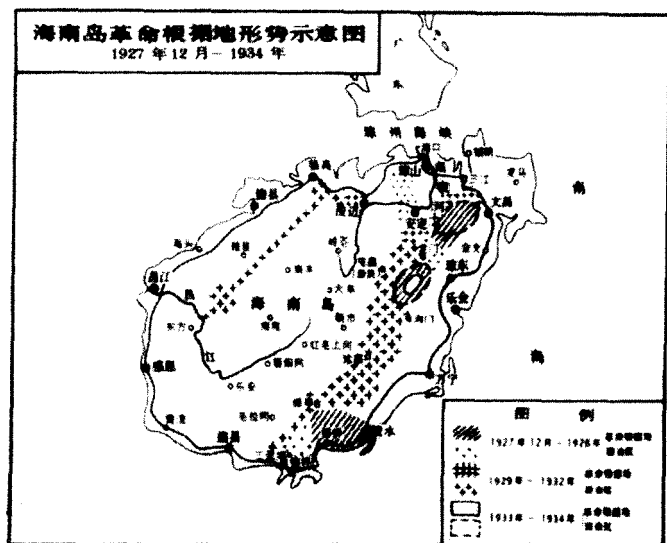
张发奎把一肚子懊恼全发向李汉魂，他大发雷霆：“你的部队呢？”李汉魂反唇相讥：“你的卫队营呢？”二人互相埋怨，张云逸则躲在一边偷笑。

第二天，起义部队全部到达南昌，而未暴露身份的张云逸仍然留在张发奎部队继续做兵运工作。

9月下旬，张云逸随张发奎部队南下，到达广州，这时，张发奎又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有一天，他把张云

逸召到自己的官邸里。“胜之,你们海南是块肥肉啊,在我碗里,谁都眼红,共产党虎视眈眈,桂系那帮人也蠢蠢欲动。”北伐后,张发奎对这位年轻有为的少将参谋长已非常信任。

“您的意思是……”张云逸一时未理解他的心思。
“镇球太不听话,我已把他调了回来,你去接替他在海南的位置吧?”



海南岛革命根据地形势示意图

黄镇球原是张发奎的得力干将，张发奎抵粤后，即

派黄镇球率兵控制了海南岛，并被委任为琼崖绥靖司令。可是最近黄镇球暗中和桂系往来，越来越不服从张发奎的指挥，于是张发奎一气之下，撤了黄镇球的职，并将其扣押在广州。张云逸一听，心里早已明白了张发奎的意思，却仍故作吃惊状：“让我去接任琼崖绥靖司令？”

“是啊，只有你去，我才放心。”张发奎点点头；“容我斟酌一下，行吗？张云逸还是故意做出一副犹豫的样子。“胜之，你一贯干脆果断，可不要在这节骨眼上婆婆妈妈的，准备一下，隔几日出发！”事关重大，张云逸马上跑去向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军委主任杨殷汇报。

杨殷一听，兴奋地说：“太好了！胜之兄，你这个琼崖绥靖司令当得正是时候！”“八七”会议后，南方局和广东省委准备夺取海南岛，它是中国第二大岛，有重要的战略位置。张发奎反共反人民，可他怎么也不会料到，自己却亲手送给共产党这么大一个人情！”

于是，张云逸带着党的重托去上任了。然而，意料不到的是桂系军阀先下手为强，收买了驻扎在海口的第33团副团长叶肇，图谋暗害张云逸。张云逸幸得同乡及时通报，换乘海轮由越南转赴上海，从此脱离反动阵营，投向光明大道而去。

去广西

1928年8月初的一天黄昏。在一个不引人注意的树阴下，张云逸正与一个中年男子接头，这个人名叫张殷、是就任不久的中共中央军事部长。

俩人坐在树下的长椅上，杨殷问：“老兄此次南游感觉如何？”

张云逸笑了笑，神情是苦涩而又幽默的，“怎么说呢，‘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当时就是这种心境。”

杨殷有点惊讶，说：“哦，原来你并非赳赳武夫哟。”

“哪里，我只不过是粗通文墨而已。”张云逸自嘲地摇摇头。

又闲聊了几句，杨殷很自然地瞧瞧四周，压低声音说：“几天前，也就是7月22日，彭德怀率领他的队伍在湖南平江揭竿而起，想必云逸兄已经知晓？”

张云逸点点头，沉默了一会儿，才说：“惭愧！”

杨殷注视着他，只听他又低低叹了口气：“彭德怀是好样的，而我……”

“老兄不必叹气了。”杨殷微笑着拍拍他的肩头，耳语道，“中央决定派你去广西……”

“是吗？”张云逸盯住对方的眼睛，笑了。他知道，此行定然是身负重任的，多年来的种种波折和变故，早就使他见惯不惊，临危不惧。他沉吟了一下，便平静地问：“我什么时候走？”

“到时候再通知你。”

1929年初，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军阀得到很大的发展，当时广西、湖南、湖北、江西、河南、河北等省，都是桂系的势力范围，这给蒋介石集团造成很大的威胁。蒋介石为要实现独霸中国的野心，决心消灭桂系势力。这一年的3月，蒋介石调动了几十万军队直逼武汉。桂系集团也在武汉云集重兵，准备同蒋介石大战一场。蒋介石了解到桂系集团中的俞作柏与李宗仁、白崇禧之间有矛盾，在战争即将打起来的时候，他通过俞作柏策动李宗仁手下的李明瑞、杨腾辉两个师在前线反桂系。于是桂系集团军队顷刻间土崩瓦解。蒋介石的军队很快控制了原属桂系势力范围的几个省。第一次蒋桂战争没有经过大的战斗就结束了。桂系军阀头目李宗仁、白崇禧逃亡国外。

同年7月，俞作柏、李明瑞回广西，分别就任广西省

主席、广西军事编遣特派员之职。俞作柏、李明瑞在大革命时期受过共产党的影响，同情革命。他们掌握政权后，请求我党派干部来广西协助工作。中共中央为了发展广西革命力量，派邓小平为党中央代表到广西做上层统战工作和负责广西全盘工作。接着，一批共产党员通过各种社会关系，陆续进入广西开展革命工作。这年5月，张云逸从上海到达香港。在一个小报的编辑部里，他秘密地同党组织接上了头。负责同他接头的叶季壮是这家报纸的编辑，通过叶季壮，张云逸又同中共广东省委负责人黄钊、陈郁以及在中央军委工作的聂荣臻等取得了联系。他们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分析了当时广东、广西的政治形势，研究了张云逸等如何进入广西的问题。叶季壮为张云逸开了同广西党组织接头的介绍信。

6月中旬，张云逸到达广州。当时广东军队总司令陈济棠，海军总司令陈策都是张云逸的老熟人。陈济棠是张云逸陆军速成学校的老同学。陈策是海南岛人，辛亥革命时他与张云逸同是革命军队炸弹队队长，他们的私交甚好，一天，张云逸到广东海军司令部找陈策。陈策一听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张云逸来了，非常高兴，热情接待了他，双方谈了分别后的情况，张云逸提出他想到广西找事做，请陈策助一臂之力。陈策非常爽快地答应

了他,说:“这好办,俞作柏、李明瑞我都很熟。”陈策只知道张云逸过去是张发奎的部下,但不知张云逸是共产党员,他为张云逸写了到广西去找俞作柏的信件。

7月,张云逸到了南宁,他凭着陈策的信件见到了俞作柏,并且很快就在俞作柏、李明瑞的军队中找到了立足点。同时,他跟党组织也接上了关系。在这期间,先后到达广西的共产党员还有叶季壮、袁任远、陈豪人、李干辉、袁振武、李谦、冯达飞、何世昌、宛旦平、沈静斋等,他们在中央代表邓小平的领导下开展统战和各方面的革命工作。

张云逸到达南宁后,担任了南宁军官教导总队的负责人。这个教导总队是在中共建议下开办的,由李明瑞部队3个师抽调的班排长所组成,下设3个营9个连,共1000余人。不久,张云逸兼任了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大队长。在邓小平和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张云逸为把这两支旧式部队改造成新型的人民武装,采取了一系列坚定而果断的措施,做了大量的工作,使这两支旧军队的面貌在短时间内发生了根本变化。

与邓小平见面

1929年10月初,正当广西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之时,俞作柏、李明瑞不顾敌我双方力量的悬殊,不听中共的劝告,贸然决定与张发奎联合反蒋,结果失败了。

形势发生了变化,张云逸根据党的指示,趁南宁政

局混乱之时,组织部队和民工,把军械库里储存的五六千支步枪以及山炮、迫击炮、机关枪、电台和堆积如山的弹药,统统搬上了汽船,由邓小平率领党委和在地方做秘密工作的同志及警卫部队,溯右江而上。张云逸率领教导总队和第四



红军时期的张云逸

大队，从两岸陆路掩护前进。几天之内，几千人的武装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胜利撤出了南宁，到左右江去开辟革命根据地。

10月18日，张云逸率领的部队，到达坐落在右江之滨的恩隆县平马镇，准备在这里作短期逗留。

张云逸大队长穿着国民党旧军服，戴着高沿帽，他在自己的住处多铺一张床，换上干净的被单。卫兵进来了，他摸出一块光洋：

“给我买一只活鸡，两条活鱼，养起来。”

卫兵多时不见他开小灶，笑着问：“大队长，今天来了贵客啦？”

“有贵客，今天到。”张云逸望着窗外的江边，心潮像滚滚的浪涛那样起伏……

他在思念一位可亲可敬的战友。他想到，在南宁的3、4个月当中，他们近在咫尺，却如相隔天涯，经常得到他的指示，久闻其大名，却看不见他的笑貌，聆听不到他的声音。

张云逸多么希望尽早见到这位出色的领导人啊！但党的秘密工作的纪律不允许。在南宁工作期间，张云逸只跟陈豪人联系。陈当时的公开身份是俞作柏的机要秘书。党对张云逸的工作指示，张云逸向上级的请示、

汇报工作，都通过陈豪人联系。

张云逸几番通过陈豪人约请与邓小平见面，回答是：部队的同志手握重兵，地下党员的身份切莫暴露，望善自珍摄，后会自有佳期。

那天张云逸带兵演习，不慎落马摔伤，脚背肿得像大粽子一般。到医院看了，仍不见效，使他疼痛难忍。

一日，一位白发老者——号称“二华佗”的民间名医来到营房。他摸捏摸捏张云逸的肿脚，突然用力一扭，张云逸禁不住‘啊’地叫了一声，待他明白是怎么回事时，错位已经复原。“二华佗”继而捶打草药，给他敷上。

张云逸心想，听人们讲‘二华佗’自恃身怀绝技、傲慢得很，就是省主席派专车接他诊病，也不一定能叫得动。而今天不请自来，营房门口受阻仍不拂手而去，不知是何原故。云逸问道：“张某有何德能，得到神医圣手如此厚爱？”

“只不过看在我儿子朋友的面上。”二华佗淡淡地说。

“啊，是哪一位朋友？老先生，我张某不明不白受人好处，心里着实不安，请告诉我吧！”张云逸诚心请求。

“二华佗”默想片刻，终于说了：“是省府那位邓秘

书(即当时邓小平的公开身份),我儿子再三关照过,你可莫乱说出去。”

“是他!”张云逸长长地嘘了一口气。心想,我和他未曾有过一面之交,可他连自己的伤痛小事,也牵挂在心上,多么难得啊……

“呜——”从远处传来一声笛鸣,这位已近而立之年的将军,竟然像即将过年的娃仔那样,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他在住室内外走来走去,时而摸摸新床铺,时而擦擦眼镜,目视着通往江边的路。

远处,两个人影越来越清晰。叶季壮正陪着一位年轻人向张云逸的住处走来。



“哎,怎么邓小平同志没有上船!”张云逸的眉头皱了皱。

年轻人微微一笑，伸出手：“张大队长，你好。”

“这位就是邓斌同志。”叶季壮指指那位年轻人

“哦，你就是邓秘书哇！我们行动的最高领导人。”

张云逸紧紧握住对方的手，使劲地摇动。眼镜后面的目光，仔细地端详着对方的脸，禁不住脱口而出：“你真年轻呀！”

“还年轻，交年就是二十五了！”邓小平说罢笑出声来。

其实，张云逸已知道战友的岁数，但是在他的印象里，那位大智大勇的中央代表，与眼前这张娃娃脸，怎么也对不起上号。邓小平的目光，也在张云逸的身上移动：自己请求党组织派来的最得力的助手，自己钦佩的北伐勇将，原来是这么一位和蔼可亲的兄长！

邓小平、张云逸两位战友终于在平马镇见面了。

张云逸召唤卫兵：“赶快杀鸡、破鱼，为贵客洗尘。”还亲自到厨房作了安排。

在平马镇，邓小平、张云逸和其他党的负责人研究了部队下一步的行动，决定进军百色，将用不着的重武器和弹药疏散到东兰、恩隆的山区保存起来。以备将来打起红旗，成立红军和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时使用。

举行百色起义

1929年10月21日,邓小平、张云逸率领部队离开平马镇,第二天,胜利抵达右江重镇百色。

百色,依山傍水,风景秀丽。低矮的房舍,狭窄的巷道,隐藏在木棉树和龙眼树丛中。小城四周围绕着无边的绿色的山峰,山城前面,右江翻着碧波向东滚滚而去。它虽说是一座人口不足一万的小城镇,却犹如城门上的一把锁,控制着云南、贵州的交通咽喉,它又是右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

自从张云逸率领队伍来到这里之后,这里就成了革命活动的中心和策源地。

在百色,邓小平主持召开了党委会,与张云逸他们一道,筹划武装起义和创建工农民主政府的各项准备工作。会议决定:公开在部队和群众中宣传我们党的主张,广泛发动群众,整顿、补充部队,实行官兵平等,建立士兵委员会,发扬民主,反对军阀制度,反对贪污,反对虐待士兵;组织和武装群众,在有工作基础的地方,



百色城

通过地方党组织将枪支发给群众，以便开展对土豪劣绅的斗争；继续清洗部队中的反革命分子。这次会议考虑到用教导总队和第四大队的名义不便于指挥地方政府，必须有一个公开的行政机构，决定利用旧有的督办官衙，宣布张云逸为右江督办。

会后，张云逸和其他负责人一起坚决贯彻党委会的各项决定。

张云逸首先行使督办职权，以行政长官的名义下发公文，在控制右江各级政权的同时，接管了财政，组织税收，把各县府的税款统统收缴到督办府。这样，一次便收到大量银元的税款，为武装起义筹集了数目可观的经费。

张云逸在认真抓紧原有部队整顿工作的同时，积极招募新兵。他走上街头，亲自做宣传，他对乡亲们说：

“我们就是穷人的兵，专门拿枪为受欺负的穷人出气报仇。”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右江地区各县的革命群众运动更加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工会、农会组织进一步壮大，群众的政治觉悟得到提高，青壮年纷纷报名要求到张督办的部队当兵，张云逸领导的队伍迅速发展壮大。

右江地区的地主、豪绅对此十分仇恨。他们跑到南宁去求援，桂系军阀密令熊镐率领广西警备第三大队到右江驻防，以对付革命群众运动，妄图消灭进驻百色的这支革命武装。邓小平、张云逸等获知这一情报后，果断地决定将警备第三大队全部消灭。

10月28日，张云逸以右江督办的名义“宴请”第三大队头目熊镐到百色“商谈防务”，在宴会上将其拿获。

与此同时，我党调集的奉议、恩隆、思林等县的农军，配合驻平马镇第四大队的一个营，向警备第三大队发动突然袭击；只用了几十分钟，就将驻平马镇的敌人全部缴械。

第二天，张云逸又亲自带队消灭了第三大队驻扎在那坡的反动武装。智歼反动的第三大队计划的实现，粉碎了敌人妄图扑灭右江革命烈火的阴谋，为举行百色起义扫清了障碍。

11月初，中共中央批准在左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创建革命根据地和创建红军的指示传到了百色。中央颁给了红七军的番号并委任了负责人。邓小平召集党委会传达中央的指示，并就武装起义的重大问题和具体部署作出决定。会后，邓小平到左江地区部署龙州起义事宜，接着又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张云逸则领导右江地区军民完成百色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12月11日，正是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在广西百色胜利举行了武装起义。

这天一早，百色山城，欢声雷动，八方锣鼓响彻云霄；“打倒军阀”的歌声传遍街巷。四乡农会会员、农民赤卫队员手持梭镖、土枪赶进城来；工人赤卫队扛着刚领到的“七九”步枪走出工厂，学生迈着整齐的步伐，歌声嘹亮；官兵们早已在广场排成雄壮整齐的方阵。一支支人流涌往广场，刹时，广场聚集了近万人，涌动起欢腾的人潮。

最引人注目的是飘扬在军部上空那一面，八尺长、六尺宽的红布大旗上，绣着镰刀锤子，旁边缀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九个金灿灿的大字，在初升的阳光照耀下，光彩夺目。

大会庄严宣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

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成立。宣布了党中央的任命：张云逸任红七军军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陈豪人任政治部主任，龚鹤村任参谋长。军部下辖三个纵队，李谦、胡斌、韦拔群分任三个纵队的司令。

接着，红七军首长高声宣布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建立工农民主政权；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列强在中国的特权；保护工农大众利益，开辟革命根据地。……真是一声掷地一声雷，每一段话都



右江工农民主政府会议室旧址

被锣鼓声和欢呼声所打断。

群众大会结束后,举行示威游行,穿着灰色新军装,军帽上缀着五角星、衣领上系着红带子的红军干部、战士,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上街头,欢呼起义胜利。一队队的工人、农民、学生兴高采烈地来到大街上,他们敲锣打鼓,载歌载舞,欢庆自己的解放。

同一天,右江第一届工农兵代表会议在平马镇隆重召开,成立了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并举行了5万多人的庆祝大会。张云逸代表中共红七军前委(红七军成立后,部队党委改为前敌委员会)专程从百色赶到平马。大会开始,张云逸军长出现在主席台上,他用带着广东口音的普通话,宣布红七军的成立,并开始了讲演。

他说“红七军的成立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的诞生,是工农群众的一件大喜事。红七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是保护工农群众利益的,我们欢迎右江父老兄弟选送自己的优秀子弟参加红七军。有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红七军一定会迅速壮大,革命一定胜利。工农民主政府是工农自己的政府,领导农民兄弟打土豪,分田地,保护工农劳苦大众的利益。现在,我们右江成立了工农自己的政府,有了自己的红军。而广西其它地区的工农兄弟还在受反动派的压迫,广西的反动派是不会甘心在右江

一带的失败的。因此，我希望每一个红军战士，每一个工农兄弟，都要拥护共产党，拥护工农民主政府，要提高警惕，随时准备反击敌人的进攻，保卫我们的革命根据地。’张军长一边讲，一边还习惯地不时用手捻他那短短的一绺胡须。

最后，他向大家发誓说“我们一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我们的力量，巩固我们的胜利！我们一定要把红旗插到全中国去！”

他那坚决有力的话语，激起了听众一阵阵暴风雨般的掌声。那面带微笑的神情，那泰然自若的举动，令人难忘。

他讲完话后，代表中共红七军前委，把包着红布的工农民主政府的一颗大印交给右江工农民主政府主席雷经天。

百色起义的成功和红七军的诞生，标志着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良好开端。它给广西反动派以沉重打击，给灾难深重的广西各族人民带来了希望。它是在广西这块富有悠久革命历史的土地上，继金田村起义开始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之后，又一次轰轰烈烈的最广泛最彻底的革命运动。邓小平、张云逸在这一革命斗争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

转战七千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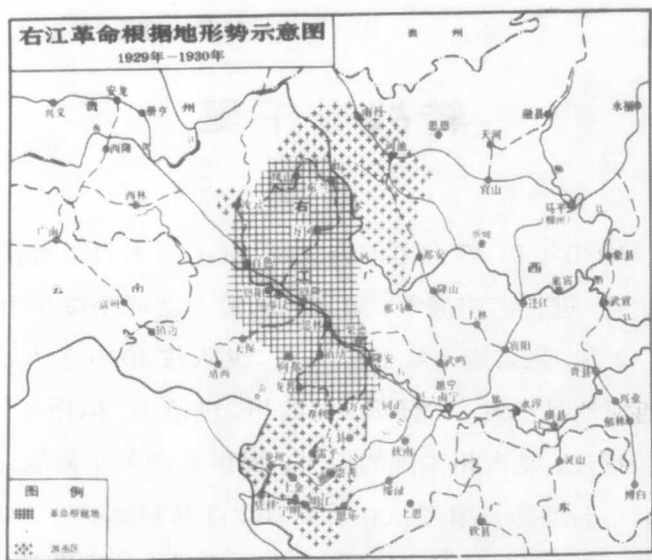
1930年初，红七军前委决定，红七军主力向黔桂边境发展，进行游击战争，第三纵队留下就地坚持斗争。

2月，张云逸率红七军一、二纵队共3000余人，从广西河池县出发，占怀远，入贵州，过苗山，抵榕江。

榕江，是贵州军阀的后方，囤积着许多军需品，由敌军一名副师长率领600余兵力数百名警察驻守。4月30日，张云逸率红七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袭榕江，攻占了榕江城，歼敌500余人，缴获步枪600多支，子弹10万多发，火炮数门和无线电台一部以及无数军用品。

红七军在榕江休整了3天，筹得军饷几万元。然后携带战利品水陆并进，浩浩荡荡回师右江。并以歼敌300名，缴枪300支的成绩，从敌人手中夺回了百色城。

经过三个月的整训，正当红七军兵强马壮，跃跃欲试，准备开辟新的局面之际，‘立三路线’指导下的中央给红七军下达了任务：打下柳州、桂林，在广东之小北江建立革命根据地，阻止两广军阀向北增援，最后夺取



右江革命根据地形势示意图

广州,以保证全国红军首先夺取武汉的‘争取一省数省的胜利’。对此,前委讨论时虽有怀疑,但还是从组织上服从中央命令,率军北进。

9月20日清晨,张云逸率领红七军准备出发时,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乡亲们,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欢送自己的子弟兵远征。只见张云逸军长迈着大步走到队伍前,向部队指战员和群众敬了一个礼,然后站在一张小桌上,发表了铿锵有力的讲话:

“英勇的红色战士们,军官们,亲爱的工农群众 我们今天要离开革命根据地了,离开亲爱的家乡、父母、妻子、同志、朋友了,但是我们的离开只是暂时的。现在我们去执行党中央交给我们的战斗任务,去打敌人,我们相信,日后一定会胜利回来的。”

在群众的掌声、欢呼声中,在嘹亮的军号声中,红七军指战员迈着雄健的步伐出发了。

邓小平、张云逸率红七军连续艰苦征战了一个多月,攻四把,占长安,袭武岗,虽然打得英勇顽强,却因敌众我寡节节失利,一直没能突破敌人的封锁线,没能攻克一座大城市。而且伤亡、减员十分严重,许多英勇善战的红军战士牺牲了,不少卓有才干的指挥员血染沙场。

一天,进入东安县的一座高山上,雨下个不停,人马疲乏到了不能再支持的程度,队伍停下来在野地露宿,有的战士装具未卸就一头倒下去睡熟了。

在一间小茅屋里,邓小平、张云逸等军部领导人围着豆粒大的油灯,在开紧急会议,研究今后的行动方向。一双双凹陷的眼睛,在灯光下显得更加深黑。大家总结了北上作战以来的经验教训,大胆决定放弃攻打柳州、桂林和夺取广州的计划。目前,队伍确实处在危险中,

必须设法找到一条出路。讨论来讨论去，最后感到只有迅速奔袭全州，以便取道湘粤边境进入江西，与朱德、毛泽东的红军汇合，才不至于被反动军队消灭在“绝地”之中。

面色黧黑的张云逸，习惯地捻着小胡子，刚毅地说：“全州是空虚的。我们的行动快，半夜出发，急行军奔袭全州，只是部队太疲劳了。”显然，张云逸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下这个决心的。他来回踱着步，倾听着屋外的风声和雨声，眼前浮现出战士们满身污泥血渍、在风雨中沉睡的情景。

“部队的确疲乏极了，但要接受这种考验，共产党员首先要做模范，走，立即走！”邓小平赞同地说。他那敏锐的目光、乐观的神态、无畏的气概，深深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号令发出了，英雄的指战员从困乏中奋起，踏上了求生之路。连续奔袭60多里，一鼓作气攻城，将鲜红的镰刀斧头大旗插上了全州城头。

部队在全州的4天，安民治军，休整补充。经过民主讨论，使大家清醒认识到：“立三路线”是断送红军、断送革命的错误路线。今后的任务应该是改向江西革命根据地前进，找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去。尽管道路

曲折，但前途是光明的。

部队又踏上了征程，敌人仍尾追不舍。红七军直取道州，连夜向江华突围。途中，刺骨的北风一股劲儿地猛刮，鹅毛大雪漫天飞舞。张云逸和红七军指战员们，这时却仍然穿单衣、短裤，脚下的草鞋早已破烂，一个个冻得脸色发青，嘴唇变紫，手脚麻木，耳朵红肿。寒冷的冰雪夺去了 80 多位战士的宝贵生命。



东兰县民主政府旧址——魁星楼。1930 年红七军来到这里，邓小平、张云逸同志曾在这里办公

在艰难的征途中，张云逸等军首长有马不骑，都把马让给走不动的战士和伤病员骑，他们和战士们一起徒步跋涉。张云逸边走边向部队作思想动员工作，激励指战员们向前奋进。出老苗山后，在乳源县大战梅花村，歼敌 1000 余人，红军也伤亡 700 多，其中干部占三分之二，部队减员很大。为适应斗争的需要，红七军前委决定将部队缩编为 55 团和 58 团，仍由张云逸、邓小平分任军长、政委。在难以立足的情况下，指战员不顾雪飞路滑，又向韶关、乐昌间的杨溪口前进，急行两天两夜，1932 年 2 月，来到了乐昌河边。

必须从这里过河，才能突破粤敌封锁线，摆脱尾追之敌。可是，乐昌河水流湍急，白浪咆哮，漩涡翻卷。唯一可供部队渡河的工具只有两条破旧的小木船，来回一趟十几分钟，且一次只能渡二十来人。怎么办？邓小平站在高坡上观察了一阵，走下来和张云逸、李明瑞研究，决定邓小平、李明瑞率 55 团先渡，张云逸率 58 团和军直属队殿后。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当夕阳斜照，天空挂满晚霞时，邓小平、李明瑞率 55 团及 58 团一部分指战员渡过了乐昌河。这时，对岸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原来，大批粤敌乘汽车从韶关向乐昌河扑来，一番激战，河对

岸渡口被敌占领了。

红七军被截为两段，张云逸和邓小平的联系中断了，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正在这时，人群中有人喊道：“军长来了！”大家回头一望，只见张云逸骑着马迎面跑来。原来，在敌人封锁渡口之后，军长亲自探路径去了。回来后，他捋着小胡子，望着大家微笑。虽然情况万分危急，但军长那泰然自若的神态，使战士们紧张而焦急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张云逸在残酷的斗争中，在敌人前堵后追、饥寒交迫的险恶环境中，从来都是冷静沉着，临危不惧的。这时，军长跳下战马，同经理处（即后勤处）处长叶季壮等负责同志研究了一阵，便严肃、镇静地向大家宣布：

“现在过不了河，队伍后退三十里。”张云逸捋着胡子，果断地下达了命令。

天渐渐黑下来了，张云逸率队伍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后撤。现在他身边只有红 58 团一部和一个特务连、两个步兵连以及卫生队、休养连、供给处等非战斗人员，势单力薄。向何处转移？张云逸彻夜不眠。清晨，他把队伍集中到一块，面对坚强的战士们，他充满信心地说：“同志们，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打不垮、拖不烂的。敌人再凶恶，也挡不住我们向江西前进。无论如何我们

一定能渡过乐昌河，到中央红军那里去。逢山爬山，遇水涉水，敌人胆敢阻拦就坚决消灭他。”

几天急行军后，他们在地方党和群众帮助下，从坪石渡过了乐昌河，突破了粤敌封锁线。怀着坚定的信念，张云逸率部向湘赣地区挺进。1931年2月中旬，到



红7军部分干部长征到达陕北后在延安合影。后排左四为张云逸

达了湖南酃县黄泥潭。这里山峦重叠，地势险要，是红色游击区。

这天，部队集合在溪边的石滩口，张云逸不时地掬

着胡子,满面笑容,他指着太阳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见到太阳了啊!必须坚决奋斗,才有光明的一天。”他又说:“现在,我们来到了根据地,只是长征告一段落,任务并没有完成。我们要参加这里的工作,配合当地武装歼灭敌人,开展土地革命,扩大游击区,尔后继续前进,找到 55 团,一同去汇合朱毛主力红军。”他的话,激起了指战员们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接着,他们在黄泥潭击溃敌人一个团,取得了红七军到达湘赣根据地后的第一个胜利。

2 月底的一天,张云逸率领 58 团在湖南水口镇与王震领导的湘赣红军独立一师第三团会合,一起向湘赣边区的永新前进。

3 月中旬,张云逸指挥红七军、独立一师和红二十军并肩作战,接连打了两个大胜仗,第一仗在茶陵李家村,58 团四连指战员运用张云逸提出的“出奇兵迂回敌后”的作战方案,击败敌陶广部两个团,歼敌 300 人,俘虏 100 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占领了茶陵、攸县和酃县。第二仗是主动出击,获得了吉安永阳大捷。顿时,58 团在湘赣苏区声威大振。

一天,红七军从敌人手里缴获了一张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上面刊登着一条消息:“共匪李明瑞残部向遂

川流窜。’张云逸看到这一消息十分高兴,经湘赣省委同意,除教导队留驻永新外,张云逸带领军部和 58 团南下寻找红七军 55 团。

在乐昌河隔断联系的 55 团等部,历尽千辛万苦,经崇义、上犹、遂川,到达湘赣边区后,也在寻找 58 团。1931 年 4 月初,红七军 55 团和 58 团终于在永新县的天河重新汇合。全军共计 3000 余人,一时军心大振。

此后,张云逸率红七军配合湘赣红军攻安福,战宜春,克茶陵,占安仁,屡战屡胜,所向披靡,保卫和发展了湘赣边区革命根据地,有力地配合了红一方面军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1931 年 7 月,邓小平、张云逸率领红七军到达江西兴国县桥头镇,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合。

此时的张云逸,心情格外兴奋,他经常来到营房,深入战士中间,鼓励大家说:“从现在起,我们是红一方面军的一部分了,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多么光荣啊!

从 1930 年 9 月到 1931 年 7 月,自离开右江根据地起,在长达 10 个多月的时间里,邓小平、张云逸率红七军转战桂、粤湘、赣四省,行程 7000 余里,在敌强我弱的危险境况中,英勇地粉碎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纠



1931年春末夏初，红七军到达湘赣边区后参加集会的情形

正了“立三路线”的错误影响，征服了种种不可想象的艰难险阻，沿途播撒了革命种子，终于实现了“会合朱毛红军”；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预期目标，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章。

会师不久，红七军领导人张云逸、李明瑞在瑞金见到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总司令朱德。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工农民主政府对红七军的战绩给予高度评价。为褒扬红七军的不朽功绩，中共中央和工农民主政府特奖给大红锦旗一面，上书四个大字：

“转战千里”

协助刘伯承突破乌江

1934年底,红军长征进抵乌江南岸,在猴场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重申了突破乌江,进军遵义的战略部署。会后,军委研究决定由一军团的一师在龙溪,二师在江界实施强渡;调一军团工兵连和干部团工兵连归二师指挥共同架桥,保证大部队在江界通过。

乌江是贵州省内的一条大江。由西南斜向东北,横贯全省,流入四川,把贵州分成南北两部分。它江岸陡峭,水宽流急,地势十分险要,是遵义、桐梓南面的天然屏障。为了阻止红军渡江,当时的贵州军阀侯之担,在蒋介石的指令下,派重兵烧毁了南岸的村庄,掳去了江边的船只,赶走了人民群众,在北岸修筑工事,凭险扼守,严密封锁了江面,以为万无一失。

为使红军迅速渡过乌江,摆脱国民党薛岳纵队的追击,毛泽东派刘伯承参谋长亲自到江边指挥,派张云逸副参谋长协助工作。他们立即赶到江边,成立了临时指挥所,又进行实地侦察。只见江水滔滔,两岸悬崖绝壁,

果然名不虚传；又值隆冬，冷风嗖嗖，大雪纷飞，满地白雪皑皑。见对岸，敌人在渡口配有连哨，渡口上游500米处有一条小路与渡口大道相通，勉强可以走人，但是那里几乎无处可以泊船，登岸困难，而且敌人还配有排哨；沿江岸敌人筑了许多工事，离江边两华里以外，配有敌人的预备队。

针对这种情况，刘伯承、张云逸判断：渡口是敌人的防御重点，工事多，兵力强，不易突破；离渡口上游500米处的小道，虽然难于攀登，但敌人防范较差，有可能夺取。于是果断地决定，佯攻渡口，主攻上游500米处小道；利用好时机，抓紧架桥。并将决定转告二师四团的耿飚、杨成武等人。随后刘伯承亲自到一军团工兵连了解架桥情况，张云逸前往干部团工兵连具体交代与二师四团共同担负架桥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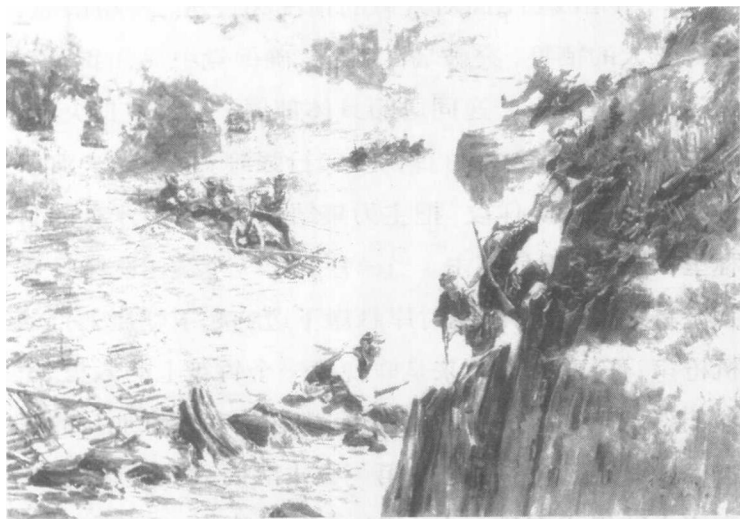
他们接受任务后，按刘伯承、张云逸的布置，耿飚团长和杨成武政委分头组织力量进行强渡。他们用了—个营的兵力，赶制了几十个竹筏，连夜又到各连队去挑选能攻善战，且识水性的战士，组成了三连连长毛振华等18名战士准备先行凫水过江。

1935年1月1日上午9时试渡开始，首先佯攻大渡口。正当敌人慌忙进入工事，以机枪、迫炮打得热火朝

天的当儿，我军在渡口上游500米处一个竹林里的八位勇士，高举耿飏、杨成武团首长给他们斟满的酒碗，一饮而尽说：“为了突破乌江，完成战斗任务，冷风冰水我们也要过去！”同时脱下上衣，打着赤膊，腰里缠着驳壳枪，头顶一捆手榴弹，扑通一声跃入水中，他们齐力拉着一条缆绳拖过江去，以便后续部队沿缆绳过江。

八勇士顶着凛冽的寒风，在刺骨的冰水中劈波斩浪，直往对岸游去，眼看快到江心了，敌人忽然发觉，射出密集的子弹，夹在中间的还有追击炮弹，打得江面浪花激溅。但他们仍然奋不顾身地向前泅渡。当游过乌江的三分之一时，敌人的迫击炮打断了八勇士拉着的缆绳，刹时间，江水的旋涡汹涌难当，一位同志英勇牺牲，其他同志不得已折了回来，第一次试渡失败。

接着决定夜间偷渡，避免敌人射击，减少伤亡，四团以三个双层竹筏，推举‘能人’作水手，配备充足的武器弹药，在寒风中划水偷渡。第一个竹筏离开江岸，没有被敌人发觉，接着两个竹筏相继下水向江心划去，顷刻消失在漆黑的夜色之中。半个钟头后，一个通讯员报告说：第二个竹筏划到江心后，被水冲下五里远，险些翻掉，过不了江，只得返回来了。接着第三个竹筏也返回来了。而第一个竹筏呢？既没有返回，也没有看到他



1935年1月，中央红军强渡乌江

（油画）

们发回来的灯光信号，因此不敢盲目地再放竹筏偷渡。

四团指战员怀着焦急不安的心情，在这漆黑的夜里，守在咆哮的乌江边直等到二日凌晨。这时张云逸顶着刺骨的寒风赶到江边，急切地传达了重要的情况和紧迫的任务。他说：追踪我们的薛岳纵队离这里不远了，军委催促我们四团迅速完成渡江任务，要求越快越好，并派来军委工兵营归二师四团指挥，共同架桥。如果我们不能过江，势必背水一战。说罢，张云逸就立即同四团干部，工兵连察看地形，研究架桥措施。

四团指战员，面对紧急的情况和任务，纷纷请战，愿作最大的牺牲，突破乌江天险，确保党中央和我军主力过江。根据张云逸同志的具体部署，四团首长决定，以 60 多个竹筏于 1 月 3 日拂晓实行强渡。同时对大渡口继续组织小部队佯攻，把主力集结在上游 500 米处的竹林里，由一营担任突击。当一营的第一个突击队乘竹筏强渡将近岸边时，忽见对岸悬崖下边响起了朝崖上打的机枪声，仔细一看，原来是昨晚第一个竹筏上的六勇士，他们忍着寒冷潜伏在悬崖底下，现在出其不意地从敌人鼻子底下杀了出来，配合第一突击队向敌人发起攻击，和突击队组成交叉火力，使敌人乱了阵脚，不知所措。

第一批突击队乘势强渡成功，接着一营全部过了江，神速地占领了高地。恰在这时，离岸边两华里的敌人预备队赶来，夺走了一营占领的阵地，一营被迫退回江边。在这紧急关头，炮兵连长赵成章和指导员王东保及时来到，向冲击我滩头部队的敌群连射三发炮弹，硝烟散去，只见那品字形的三个炮炸点的前后左右，躺着一大片敌人尸体，其余敌人鬼哭狼嚎地向后溃退，我滩头部队又乘势发起猛烈的进攻。二师二团乘胜踏着工兵营用竹筏和门板架起的浮桥冲过了乌江。

随后，一军团也踏着浮桥浩浩荡荡跨过了乌江，中

央机关也顺利地踏着浮桥过了江。敌人号称的乌江天险，终于被我们突破了。

当薛岳纵队追到江边时，红军战士已经烧掉了浮桥，跃马在乌江岸的上游百里之外了，他们只落得望江兴叹而已！

做统战工作

1935年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领导下，红一方面军胜利抢渡金沙江，于5月飞渡大渡河，继续进行长征。

1935年9月，由于张国焘进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活动，红一、三军团编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张云逸任支队副参谋长。他坚决站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一边，旗帜鲜明地拥护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反对张国焘搞分裂。11月，中革军委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番号，张云逸仍为军委副参谋长兼红一方面军副参谋长。后兼任后方办事处参谋长，协助后方办事处主任周恩来做了大量工作。12月初，经中共中央批准，张云逸参加了处理陕北错误肃反的五人委员会，为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平反，保护了一大批坚持陕北斗争的好干部。

1936年2月，为响应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迫切要求和巩固扩大现有苏区，中央决定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

先锋军，彭德怀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政委，叶剑英为参谋长，张云逸为副参谋长，渡河东征对日作战。东征期间，张云逸主要负责后方联络与后勤工作。5月初，东征红军在取得一系列胜利之后，为了避免全面内战爆发，保存抗日力量，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决定回师河西，并组成了以张云逸为司令员的渡河司令部。同年12月，张云逸被任命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6年两广事变后，受中共中央派遣，往来于广州、香港、南京、武汉、福州、桂林等地，在国民党上层军队人员中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1937年4月的一天，在山西省吉县附近黄河边上的一个小村庄里，一个简朴的送别晚宴在一间普通的民房里进行。主人张云逸同志频频举杯，为即将返回广西的客人刘仲容先生祝酒，祝他旅途愉快，一路顺风。刘仲容也一再举杯，感谢主人的盛情款待。晚宴自始至终洋溢着友好、团结的气氛。

刘仲容是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麾下的一位要员。他早年受过进步思想的影响，同好些共产党员有过来往。1936年12月，他受李宗仁的派遣，作为桂系的代表到西安同张学良、杨虎城商谈要事。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先后会见了，

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

1937年1月下旬,他应周恩来的邀请从西安到延安去,在那里停留了两个月。毛泽东同志多次接见了,向他了解广西的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情况,向他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希望各种政府力量联合起来,共同督促蒋介石实现他在西安的

诺言,发动抗日战争。在延安的参观学习,使刘仲容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赞成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他表示愿意回去做桂系的工作,为抗日救国的大业贡献自己的力量。4月,毛泽东与刘仲容见了面,告诉他我党准备送



1937年,张云逸在延安

他经山西返回广西。他的一切行程由伍修权同志安排。为了他的安全，一路上我党都派有人加以保护。

在吉县为刘仲容饯行的第二天，张云逸亲自送他渡过黄河去，然后才分手。临别时，张云逸告诉刘仲容，他也要出远门，希望不久能在香港或桂林再见面。

这年5月，张云逸肩负重任，从西安辗转到达香港，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在华南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桂系军阀势力，是国民党在华南的重要地方实力派。他们同蒋介石集团既有一致的方面，又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步步深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他们也多次表示要抗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引起了他们的共鸣，为了在民主团结的基础上联合桂系共同抗日，促成全国全面抗战的实现，张云逸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香港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活动后，即进入广西开展工作。

在张云逸到广西之前，中共中央先派了共产党员杨必升(即杨德华)到桂系同桂林方面进行联系，转达了我党中央拟于近期派张云逸为全权代表到桂林与桂系方面谈判合作抗日的意见。张云逸到香港后也派了人到桂林同刘仲容取得联系。

李宗仁对张云逸这次访桂，十分重视。他召集了有白崇禧、黄旭初、李任仁、李品仙、王公度、甘介候、黄同仇、潘宜之等桂系高级官员参加的会议，商量决策。对张云逸的桂林之行，桂系方面由王公度作了周密的安排。

6月初，张云逸在秘书李实（即罗理实）的陪同下，从香港乘港梧轮到达梧州。梧州公安局长李一尘亲自接待张云逸，并派汽车把他送往桂林。当汽车到达荔浦车站时，刘仲容奉派在那里迎候，并陪同张云逸一起来到桂林。由于王公度、刘仲容的安排，张云逸到桂林不久，即同李宗仁见了面，并开始了会谈。刘仲容还派了人对张云逸进行了秘密保护。

当时广西的文武官员思想比较混乱，有的对抗战缺乏信心，有的高级将领对蒋介石会不会参加抗日表示怀疑，有的认为蒋介石已停止“剿共”，很可能会抽出兵力来压迫地方势力，广西应对付新的蒋桂战争。李宗仁、白崇禧也说：“蒋介石不可靠，我们不要上蒋介石的当。”针对上述情况，张云逸在6月12日同李宗仁、白崇禧的首次会谈中，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阐明了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他强调指出：

当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团结抗日，救国图存是全民族的需要。只要是抗日派，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我们党随时准备和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合作，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的主张就是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阶级、阶层，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说：

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逼蒋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必要的。现在，抗日是人心所向，这是蒋介石阻挡不住的。经过西安事变，中国



1937年，张云逸（二排左四）与红军联络处全体同志合影。后排左一为周恩来，后排左五为叶剑英

的局势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蒋介石不打日本打内战，办不到了。和平是当前民族救亡的需要，也是中国人民的一致要求。我们共产党人只要是对国家民族有利的事情，只要是群众要求做的事情，我们就要积极去做。我们有充分的条件，联合各个方面的力量，逼蒋抗日。一切抗日救国的力量团结起来，抗日一定会胜利。

李宗仁、白崇禧在会谈中，表示赞同我党对形势的看法，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愿意团结抗日，共同对外。

几天之后，在第二次会谈中，李宗仁完全同意我党提出的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和团结抗战等主张。双方商定，由张云逸与桂系几个高级官员研究拟出如何巩固和平统一，实现民主和团结抗战的具体方案。张云逸在桂林期间，四川军阀刘湘也派出代表张斯可到桂林联络。经李宗仁介绍，张云逸同四川代表见了面并进行了会谈。张云逸还请张斯可一起参加关于巩固和平，实现抗战具体方案的制定。

张云逸同桂系和四川代表所进行的联络工作，很快为蒋介石的特务机关所察觉。蒋介石下令要其在桂林的特务密切注视张云逸的活动，并加紧拉拢，分化桂系集团，扶植桂系内的亲蒋势力，而在桂系的一些高级官员

中,如黄旭初、潘宜之等人,也以“不能抄袭共产党的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为借口,反对同我党联合抗日。

经过张云逸的难苦工作及同桂系、四川方面的代表反复磋商,6月下旬拟定了联合抗日的七条纲领草案。这个纲领草案的主要之点是:巩固和平统一,实现民主政治,团结抗日,收复失地,召开国防会议,充分接受各方抗日领袖主张,树立抗日旗帜,扩大抗日宣传,开放民众运动,改善人民生活,释放政治犯,开展国民会议制宪运动,国民会议代表名额应分配于各党派指定,各抗日力量彼此应团结互助,以充分力量推动中央领导实现抗日,不得含有分裂民族统一战线的企图。

这个纲领草案的内容是符合实际的,它反映了广大人民的要求和愿望。毛泽东收到张云逸的报告后,即在6月26日回电,予以充分肯定。他说,纲领草案是对的,我们赞成本此去做,并促请桂方向粤、港、沪联络,推动各方也努力去做。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大举进攻华北,中国驻军奋起抗战。7月8日,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同一天,中国工农红军将领发表致蒋介石电,号召全民族抗战,呼吁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进攻。

张云逸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再次同李宗仁会谈,

李宗仁即同意致电华北及南京政府表示支持抗战。四川省当局通过其驻桂代表，询问我党对卢沟桥事变的主张。张云逸在同张斯可会谈时介绍了我党主张全国抗战的坚定立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四川方面对我党的正确主张深为赞赏，并主动邀请张云逸到四川去同刘湘商谈。

七七事变后，李宗仁以华北形势危急，要求张云逸留在桂林，以便讨论对策。同时，再度派刘仲容赴延安，作为广西的常驻代表，同中共中央保持联系。张云逸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继续留在桂林，并来往于桂、粤、港之间，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对推动桂系走上团结抗战的道路，采取抗日的实际步骤产生了影响。

8月4日，白崇禧由桂林飞往南京，代表桂系与蒋介石会晤，商讨广西出兵抗日事宜。不久，白崇禧出任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李宗仁出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广西全省也动员起来抗战，扩编军队，组成四个军共40个团，后又编为三个集团军，统称为第五路军。随后，广西军队即开赴前线抗日。

8月初，张云逸经李宗仁介绍到广州同广东当局余汉谋会谈。经过多次谈判，余表示同意国共合作，全面抗战，并同意在广州建立八路军办事处。

劳山遇险

1937年3月,中央组成了军委后方司令部,刘伯承为司令员,张云逸出任参谋长,刘伯承不在期间,由张云逸代理司令员。

4月,为贯彻中共中央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地方实力派和各阶层人士投入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促成全国抗战的实现,党中央决定再派张云逸到华南进行统一战线工作。

4月下旬,张云逸正准备动身离开延安经西安到香港去。恰巧这时周恩来、孔石泉等同志也要经西安到南京去同国民党继续谈判,这样,他们便一同上路。为了保卫首长的安全,中央保卫局专门派了特务队一个由12人组成的警卫班随车护送。

除了周恩来以外,张云逸便是这支队伍的最高军事长官,虽然他也是被护送的首长之一。但他还是自觉地把保卫周恩来看作是自己的最大责任。出发前,他对照地图详细地研究了行进路线,对公路两旁的地形地貌都

作了研究，然后根据自己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同国民党打交道的经验，一再告诫随行人员和警卫战士，要充分认识到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他要大家提高警惕，严格遵守纪律，防止敌人的破坏和暗害。

4月25日，太阳刚刚从东方升起，一辆载着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等30来人的卡车，从延安出发，朝着西安方向驶去。周恩来坐在驾驶室里，早晨的黄土高原一片宁静。汽车在公路上急驶，车后扬起阵阵黄尘。这次一同前往西安工作的人员和警卫人员，多数是年轻人，大家坐在车厢里，说说笑笑，情绪很高。

张云逸表面上虽然同样轻松，但内心却始终不安，西安是国民党统治地区，情况复杂，心中无数，必须加倍警惕，随时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敌情。

汽车离开延安60里后，来到甘泉县劳山北面的湫沿山。这里山岭起伏，古树丛生，是延安的南大门。当汽车爬上山颠峡谷，进入一个狭窄的拐弯处时，突然枪声大作，200多敌人从正前方公路上挖的工事里，从后面的小山包和左边的树林中同时射击，形成三面包围的态势。密集的子弹像雨点似地朝汽车猛烈地射来，一听到枪声，张云逸知道中了敌人的埋伏，但因山路崎岖，

卡车不易冲出敌人包围圈，而且迎面来的子弹随时可能射伤周恩来。这时，周恩来疾速跳下汽车，喊道：“快下车，散开打！”张云逸和孔石泉迅速跳下车，协助周恩来同志指挥干部战士利用汽车和有利地形，就地还击敌人。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大家奋力抵抗，使敌人不能一下就冲过来。战斗不久，警卫员刘九洲负了重伤，司机的腿被打断了，周恩来的随从副官陈有才也负了重伤，最后牺牲在战场上。张云逸的手也被敌人的枪弹打伤，他临危不惧，念念不忘周恩来的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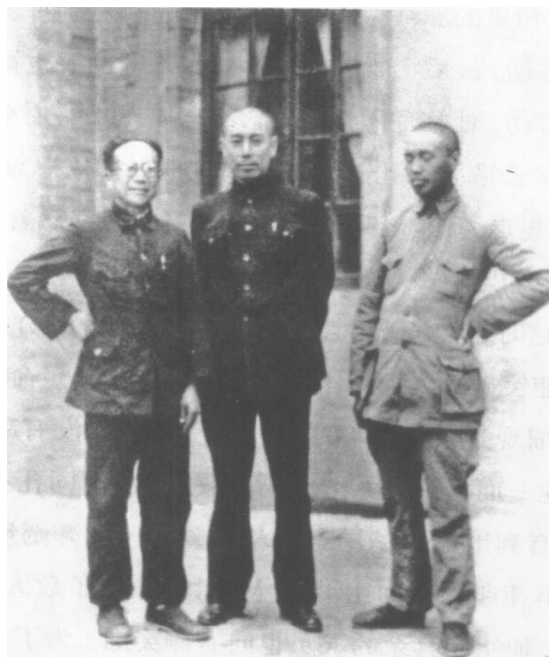
张云逸要求孔石泉寻找隐藏地保护周恩来，他说：“你们先走，我是老兵了，战死无憾！”他强忍着伤痛，指挥同志们坚持战斗，以掩护周恩来突围。

这时，我方伤亡人员越来越多，情况万分危急，必须迅速突破敌人的包围。张云逸不顾个人生命安危，经过仔细观察，从敌人的枪声中发现右侧没有敌人。于是，他一面指挥大家继续还击敌人，一面同孔石泉一起利用有利地形掩护周恩来从右侧的一片开阔地跨进沟壑，迅速爬入对面山坡的丛林中，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同时，他组织其余的人员也向右侧突围。为了分散敌人的火力，减少人员伤亡，大家朝着同一方向分散前进。

经过顽强的拼搏，突围出来的同志终于又会合在一

起。然后大家向北翻过一座大山，来到二十里铺的公路边。这里有我军的一个兵站，驻有少量的部队，当这里的部队听到山那边传来的枪声时，即刻电告延安。同时，出动人员前来营救。

党中央和毛泽东接到报告后，立即指示派出骑兵急驰劳山援救。当我军骑兵和其他部队赶到时，战斗已经



1937年5月，张云逸（左）同周恩来（中）、孔石泉等25人从延安乘车去西安，途经劳山时遭土匪袭击，死伤20人，这是脱险后在西安留影

结束，敌人已经逃得无影无踪。看到周恩来、张云逸等同志脱险，大家都为他们感到庆幸。同时，也对牺牲了的同志表示沉痛的哀悼。最后，救援部队把伤员和烈士的遗体运回了延安。

后来证实，劳山事件是敌人事先侦得我们的行动后，设下的埋伏，其罪恶目的就是要谋害周恩来副主席。周恩来的随从副官陈有才，因经常跟随周恩来出入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官邸，身上带有周恩来的名片，穿的服装也是同周恩来一样的呢子制服。当敌人冲到卡车跟前，见陈有才穿的服装并从他身上搜出周恩来的名片时，以为阴谋已经得逞。加上害怕红军增援部队赶来，就仓皇撤退，没有再追击。

劳山脱险后，童小鹏为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拍了一张合影相。周恩来风趣地对张云逸说：“云逸同志，我们不仅是战友，又成了难友了。”

张云逸说：“这次周副主席能脱险，真是不幸中之大幸，你要有个闪失，我这个老警卫员可就成了千古罪人了。”

张云逸十分怀念在劳山事件中英勇献身的人，他一直把当年和战友一起合影的珍贵照片保留在身边，直到逝世。

参与组建新四军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中共中央同国民党谈判达成的协议，将南方八省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为组建新四军，张云逸受党中央委托，曾到澳门同叶挺联系。叶挺在九一八事变后，从国外回到澳门居住已经多时，国民党曾对他进行利诱，欲委以军事要职，要他反共，遭到叶挺的严词拒绝，他依然过着贫苦生活。而叶挺却急切地盼望找到我党的组织，为此他曾从澳门寄信上海给阳翰笙，要阳翰笙去澳门看看他。阳翰笙把这封信交给了中共中央上海宣传部朱镜。由于当时斗争紧张，组织上未能让阳翰笙去澳门，答应另外派人设法和叶挺联系。

张云逸在大革命时期和叶挺同在张发奎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工作，那时就互相熟悉，他对叶挺那种诚实、勇敢、以身作则和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革命军人品质，深感钦佩。这次受党中央委托到澳门与叶

挺会见，两人万分高兴。张云逸代表党中央热情地欢迎叶挺同我党联系，回国参加抗战。

叶挺同我党取得联系后不久即回国内，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了叶剑英，后到延安，会见了毛泽东，叶挺在了解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之



后，毅然同意出任新四军军长。11月12日，叶挺从延安回到汉口，就着手进行新四军的筹建工作。

张云逸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于10月下旬从香港回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之后，也奉中央之命到新四军工作。他是最先到汉口同叶挺一起筹建新四军的我党高级干部。经过筹备，新四军军部于1938年1月在南昌正式宣告成立。由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周子昆任副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四个支队。张云逸还兼任第三支队司令员。

新四军军部成立后，立即命令各省游击队限期集中，江南的各省游击队向安徽的岩寺集中，江北的鄂豫皖及鄂豫边区的游击队向安徽的合肥、舒城、无为地区集中。

张云逸根据军部的指示，1938年2月再度入闽，他这次入闽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了解闽东、闽北游击队组织编情况，并把部队开赴皖南集中；二是去福州同国民党地方当局商谈成立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

2月9日张云逸从南昌到达闽浙赣边委所在地——江西省铅山县的石塘村。在那里他抽调了一批干部筹建新四军第三支队领导机构。除了由他兼任支队司令员，

谭震林任支队副司令员外，还任命了支队的其他负责干部，同时，还抽调了一批干部到支队司令部、政治部机关工作。支队下辖的两个团，由饶守坤任第五团团长，曾绍铭任副团长，由叶飞任第六团团长，吴 任副团长。

张云逸在石塘村筹建了第三支队领导机构后，带领王助、孙克骥以及秘书、记者、机要员、警卫员等 10 多人向福建进发。

当时要将分散的红军游击队改编集中是相当困难的。不仅要克服战士长途步行跋涉和粮饷不足的困难，还要在坚持团结抗战的方针下，同坚持十年反共立场的地方当局和驻军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张云逸一行从石塘村出发时，大雪初霁，杉松岭上，白雪皑皑，虽然路途跋涉难辛，但见松林傲立，竹丛青翠，空气清新，大家精神倍增，激情焕发，倒也不觉疲劳。2月11日到达崇安，经崇安县城顺建溪而下，抵南平，改乘汽船，沿闽江到左田县的谷江镇，住在镇上江边的一家客店中。翌日，又乘汽车抵古田县城，去拜访国民党古田县长，准备了解洽谈叶飞部六团北上问题。

当时，由于我闽东部队，在春节的前一天，已接到军部的电报，要他们开赴皖南岩寺集中，因此，部队已由叶飞率领于农历正月初三取道浦城到浙江去了。长期

反共的古田县长，见到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到来，迫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形势，不得不表示欢迎。当晚，县长设宴款待张云逸参谋长，当地驻军一位保安旅长也在座。席间，县长谈到六团集中出发的情况后，竟狂妄地下断语说：“我看叶飞的部队到不了浙江，就要跑光了。”张云逸不以为然地笑着回答说：“不见得吧，这是一支经过残酷斗争锻炼具有政治觉悟的部队。”又说：“如果真的跑光了，那不正是日本人所高兴的吗？我们中国人有什么高兴的。”县长碰了一鼻子灰，只好搭讪着，顾盼左右而言他，转而向当地驻军保安旅长敬酒，并恭维了他一番。

那位旅长一杯酒下肚，居然得



1938年1月，时任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一流支队司令员的张云逸

意忘形，吹嘘起自己与蒋介石的师生关系来了。张云逸听后，便故意问他：“蒋委员长近来好吗？我和他已多年不见了，我们还是民国初年在许崇智幕僚中共过事的呢！几十年不见了嘛。”这位旅长一听，愣了一下，面色由得意转而羞惭，不知如何下台，他自知无论是斗理斗智，都不是这位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张参谋长的对手，只好甘拜下风，便改口连连说：“张老前辈，晚辈无知，请多教诲！”向张参谋长恭恭敬敬地敬了一杯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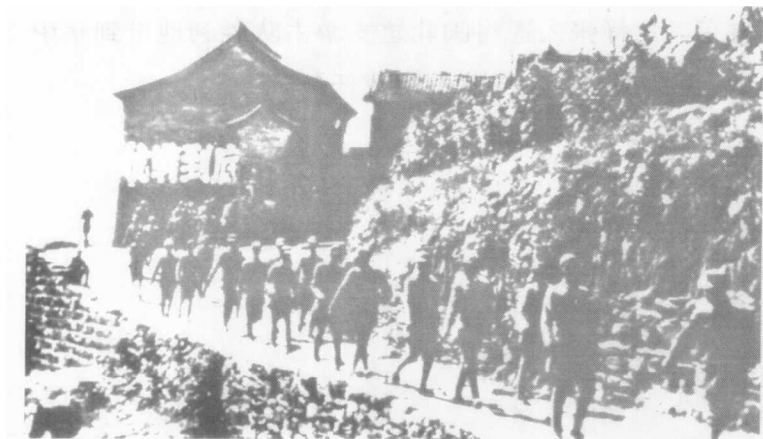
张云逸十分挂念着叶飞部队沿途的安全，第三天，回到谷口，张云逸立刻要孙克骥送信给叶飞。孙克骥接受任务后，即沿叶飞部前进的路线迅速赶去，到了浙江常山县的球川镇，找到了部队，将信交给了叶飞，传达了张参谋长的口头嘱咐，要他们沿途警惕国民党军队的破坏和袭击。由于叶飞部队保持着高度警惕，终于安全地到达安徽岩寺集中。

张云逸又从谷口出发，23日来到福州，经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议的同意，于2月底正式成立了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地点设在福州城内安民巷27号（现为53号）由王助任办事处主任。张云逸在同陈议谈判中，还促使他同意释放了七八位我党被捕的同志，归还了被国民党缴械的我闽中游击队的人员和枪支。之后，张云逸又到

漳州向驻闽粤军再次交涉，促使他们归还了被缴的我何鸣部队的人员和枪支。这些归还的人员见到张云逸参谋长时都非常激动地说：“我们像是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一定上前方杀敌立功，永远跟共产党，干革命到底！”张云逸参谋长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教育他们吸取何鸣事件的教训，保持革命的警惕性，并将归还的枪支和收集到的闽南游击队员 100 多人，一起带到闽西交给张鼎丞。后来，这部分人员编入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一营。

随后，张云逸又由闽西返回闽北，动员游击队下山集中，向他们说明下山集中编为共产党领导下统一的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开赴前线抗日的意义，解除他们的疑虑。集中后，张云逸同胡荣一起将闽北部队带到江西铅山石塘村，再从江西的铅山经横峰、德兴一直带到安徽的岩寺集中。

在张云逸的带领下，部队在行军中，纪律严明，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沿途在哪里住都要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宿营地住所都要把房子内外打扫得干干净净，借的东西及时归还，损坏的东西一律按价赔偿。临走时都要把房东的水缸挑满，沿途不准抓一个民夫，有重病号自己搞担架抬，轻病号则由别的同志帮背枪，背东西，还组织收容队，收容掉队的同志，他还经常去



活跃在敌后坚持抗战的新四军一部

检查执行纪律的情况，看看地扫干净没有，借的东西归还了没有。沿途的群众，看到的和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完全两样。老百姓都说，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

在行军中他常常深入连队班排，详细询问有无掉队的战士和病员，询问大家是否疲劳。每到一個宿营地，都再三嘱咐战士们用热水洗脚，发现病员，就立刻亲自去看，请医生诊治，还关心病员的饮食，嘱咐炊事员煮稀饭给他们吃。

一路上整个部队团结得比兄弟还亲，部队很少有开

小差的，有的怕离开自己家乡而跑了的，又自动的转回来了。这样张云逸将闽北这支游击队胜利地带到集中地，并完成了第三支队的组建任务。

新四军江北总指挥

在皖南期间，张云逸坚决拥护和贯彻中共中央关于东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积极开展游击斗争。他与谭震林率领新四军第四支队在皖南对日、伪军英勇作战，先后取得了清水潭、马家园等战斗的胜利，毙伤日伪军 300 余人。

1938 年 4、5 月间，党中央、毛泽东指示新四军第四支队在江北皖中展开。11 月，张云逸率军部特务营抵达江北无为地区，传达贯彻东进方针，恢复已被取消的挺进团，指挥新四军第四支队第 8 团挺进淮南津浦路东，开展皖东游击战，扩编江北游击纵队，担负开展皖中地区抗战任务，并及时向第四支队传达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在他的推动和督促下，第四支队全部东进。1939 年 3 月，到达合肥东北众兴集一带。这时，国民党加强对新四军行动的限制，同时派重兵与新四军争夺皖东敌后。这一局势，给发展皖东和江北的抗战局面带来极大困难。张云逸再次深入江北各部队，传达贯彻中共中央放

手发展江北的指示精神。为此，1939年5月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统辖江北新四军部队和游击纵队，张云逸担任指挥，并兼任中共江北指挥部前委书记，统一领导新四军江北部队。



1938年7月1日，新四军军部由岩寺迁至安徽泾县云岭。这是张云逸（前坐地者，右为陈毅）同参加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扩大会议的人员在一起

在张云逸的领导下，积极贯彻中共中央的方针，放手发展抗日武装力量，扩编部队。8月，以第四支队第8团为基础，扩编组成了新四军第五支队。第四、五支队稍经整顿后，从皖中庐江、无为一带分别开赴淮河以南

津浦铁路东西两侧,开展游击战,经过4个月连续作战和发动群众的工作,初步完成向皖中、皖东敌后的战略展开。到12月,江北新四军部队迅速发展将近万人。

12月下旬,张云逸与徐海东、罗炳辉一起,采取“诱敌深入”“敌退我进,敌守我攻”的战术,指挥新四军在津浦路西周家岗、大马厂等地同日军进行3天激战,毙敌160余人,乘胜收复周家岗、大马厂、古河等地,取得了我军在皖东首次反“扫荡”的重大胜利。至此,我军威震皖东为开辟淮南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1939年冬,刘少奇到达江北指挥部传达中央“向敌后发展”的方针。张云逸坚决拥护中央的指示和少奇的领导,推进了皖东的抗战局面。1940年春,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张云逸在指挥部队充分作好自卫反击准备的同时,呼吁团结抗战。但国民党顽固派置民族大义于不顾。3月初,蒋介石命令国民党第21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向我津浦路西进攻,接着又令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韩德勤所部,向我津浦路东进攻,妄图夹击消灭江北指挥部。

张云逸此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坚决执行党中央反摩擦的方针和中原局刘少奇的指示,积极做好自卫反击准备,坚决贯彻先击桂顽,后击韩顽的方针,集中

主力于津浦路西，攻克定远城，取得了反桂顽斗争的胜利。继又指挥第四、五支队及由苏中向路东增援的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展开了以来安县半塔集为中心的反韩自卫战，此战歼顽军 3000 余人，打退韩顽的进攻，乘胜解放了天长、六合、盱眙、来安、嘉山等县的广大地区，开辟了皖东抗日根据地。陈毅同志曾说：“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才有黄桥。”高度评价了半塔集自卫反击战的重大意义。

定远、半塔集自卫反击战的胜利，是华中新四军首次大规模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反共“摩擦”的重大胜利，不仅狠狠打击了顽固派的反共气焰，创建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范例，而且为坚持津浦路东、路西阵地，建立皖东根据地以及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创造了良好条件。在这场反顽斗争中，张云逸正确指挥调动部队，巧妙运用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打得果断勇猛，停得及时恰当，谈得理直气壮，为保卫、巩固和扩大皖东抗日根据地作出了突出贡献。

自卫反击胜利之后，张云逸等江北指挥部领导人，根据中央和中原局刘少奇的指示，从江北指挥部所属各主力团派出大批干部，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协同地方党组织，建立健全各级政权。张云逸以江北指挥部名

义，独立自主地向定远、六合等 10 余县委派了县长，成立县、区、乡各级民主政府和参议会，组织农会和各级人民抗日自卫队。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直接威胁着南京等城镇的日军及两条铁路运输线，引起日本侵略军的恐慌。



1939 年 5 月，张云逸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大会上讲话

6月初，津浦铁路和淮河沿线的日伪军，对皖东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国民党顽军也趁火打劫，由古河、梁元进占古城集、青龙厂等地，企图把新四军部队“挤”出津浦路西。张云逸指挥第四、五支队，袭击敌据点，破击津浦铁路，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同时，于古城集对顽军展开猛烈反击，经过3天激战，歼敌千余人。

随后，张云逸坚决贯彻了坚持路西，巩固路东，向西防御，向东发展的方针，指挥第四、五支队，配合陈毅、粟裕部队和八路军南下部队开辟淮宝地区，沟通皖东与淮海两个地区的战略联系，策应苏北新四军部队的反顽斗争，并造成继续发展苏北的有利态势。9月，张云逸又同邓子恢等江北指挥领导人分散到各个部队，指挥粉碎了日伪军万余人兵分七路，对皖东根据地的分进合击。经过12天反“扫荡”作战，打击了日伪军的疯狂气焰，丰富了反“扫荡”作战经验，锻炼了根据地军民，保障了根据地的建设与发展。

妻儿被扣

1940年春,国民党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张云逸所领导的部队及游击根据地,处境相当危急。面临国民党顽固派大军压境的严重形势,张云逸镇定自若,他与中原局刘少奇、郑位三等领导人通宵达旦地研究和部署作战方案。在张云逸的统一指挥下,主力部队和地方党群组织、自卫队相互配合,取得了路西、路东反顽作战的胜利。

可是,国民党顽固派并没有因此罢手,不仅在军事上紧锣密鼓地加紧进攻准备,而且,他们还不择手段,以更卑鄙的方式,到处捕杀迫害我军官兵及其家属。1940年3月22日,张云逸的妻子韩碧和10岁多的儿子张远之被扣押。一起被扣押的还有新四军的干部和护送的战士25人,以及他们携带的7万元军款和枪支弹药……

张云逸的妻儿一行被扣押的消息传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以后,指挥张云逸和参谋长赖传珠极为愤怒,他

们认为自从国民党政府颁发《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以来，国民党顽固派先后制造了平江、竹沟、鄂东等惨案，屠杀共产党人。这次保安八团又扣押我方人员，也是皖中顽固派制造摩擦的开始，我党我军必须采取有效办法，化险为夷。于是张云逸致电蒋介石、林森、李宗仁、白崇禧，怒斥他们的罪行。

张云逸在电文中要求国民党政府下令释放妻儿及曾绍铭(团政委)等官兵，立即归还我新四军枪支、弹药和军款，还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通令所属各部绝对不能残

害我新四军官兵及家属子女，对违法者，必须以军法严处！

张云逸的妻子韩碧出生于广东省文昌县一户贫苦



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

农民家里。她自幼随父母沿街乞讨，吃尽了人间痛苦。几年后，父母先后病逝，她便到广州一家工厂当了童工。1922年，在粤军担任营长的张云逸看到粤军总司令陈炯明背叛了孙中山，大失所望，便离开粤军隐蔽到广州一家医院，准备另图实施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纲领的办法。

1923年，经人介绍，张云逸和韩碧喜结良缘。俗话说夫贵妻荣。但是，韩碧和张云逸结婚以来，连团聚的日子也很少啊！儿子远之刚刚半岁时，张云逸就告别了妻儿，为党的工作而四处奔忙。一别8年，未与妻儿见过面。

1937年上半年，时任红一方面军副总参谋长的张云逸奉党中央之命，到香港开展华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他和亲友多方寻找，终于找到了隐蔽在广州以理发为业的妻子。他含泪把妻儿接到香港，妻子协助他做党的秘密工作。

到香港，他们一家人住在一间不到15平方米的阁楼上。这里狭窄、低矮、闷热，既是寝室又是办公室。室内放着一张硬板床，一张桌子，一把藤椅，还有木凳，拥挤不堪。

虽然条件简陋，工作繁重；然而、韩碧母子却感到十分满足。这总是个家呀！儿子受到父亲的抚爱，夫妻

团圆和睦。

半年之后，张云逸又要离开香港返回延安，妻儿也要跟他去延安。

张云逸耐心地劝道：“咱们一起走目标太大，等我回去把一切安排妥了再派人来接你们母子俩，这样比较安全些。”

韩碧嫣然一笑，说：“那好，我和儿子耐心等待吧！”就这样，这对恩爱夫妻又离别了。

如今，组织上多方设法委托曾昌明将他们母子带到桂林，再经组织送往淮南张云逸所在部队。不料他们从皖南军部过长江以后，路经安徽的无为县襄安镇时被国民党安徽保安第八团扣押。

当国民党顽固派知道韩碧是张云逸的妻子时，竟手舞足蹈，欣喜若狂。他们要把韩碧和十岁多的远之扣作人质，想借韩碧软化张云逸。他们起草了一份电报，急速将韩碧等一行被扣详情报告给蒋介石，国民党南京政府立即回电：“同意，秘密扣押，当作人质。”

一天，保安第八团团长邱正华威迫韩碧给张云逸写信，邱正华说：“我对张云逸将军是十分佩服的！自从他领导百色起义后，军事天才就已名闻寰宇。我们的蒋委员长对他十分器重，你写信劝劝，只要他到蒋委员长这

边来，发表一条小小的声明，一来与妻儿可以团圆，二来也能高升”

韩碧深明大义，她冷笑了笑说：“云逸早年参加辛亥革命，为国为民奔走，革命意志坚定不移。他参加共产党，坚持革命，坚持抗日有什么错？为什么要他离开共产党，投向你们国民党？这样的信，我不会写。”

邱正华阴险假笑道：“哎，张太太，我可是一片诚心，为了你们全家的幸福。”

韩碧愤然回答：“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我们新四军忍饥挨饿，天天与日本鬼子作战，你们掉转枪口屠杀自己的同胞及家属，你们还谈什么慈善？谈什么全家幸福！”

邱正华发怒了：“我看你还是放明白点好，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不写这封信，将来就有啃不完的苦果子。”

她面对顽固派威武不屈：“你们抓了我，要打，要杀，随你们的便！我宁愿一死，也绝不出卖自己的灵魂。”

她将生死置之度外，敌人的刺刀又奈她何呢！

张云逸为营救妻儿及新四军官兵，他和赖传珠商量，选派江北游击纵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田丰少校，带领警卫员和马夫，前往无为县城与保安旅司令吴绍礼谈

判。不幸的是田丰等三名谈判人员也遭扣押，受到严刑拷打，最后，竟被惨无人道地活埋了。

田丰遇害后，顽军不仅不释放新四军被扣人员，反而将他们陆续杀害。团政委曾绍铭也惨死在顽军的屠刀下，除一人逃跑外，只剩下受尽折磨的韩碧母子。

这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副主席出面，亲自过问此事，向蒋介石等反复申明大义，要以国家民族为重，尽快释放新四军官兵家属以利抗战。

直到1940年9月，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才释放被扣押了7个月之久的韩碧和儿子张远之。

韩碧从血泊中走出来了，10岁多的张远之也经历了一次严峻的考验！

韩碧、张远之从岳西辗转来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驻地淮南。韩碧见到了丈夫，热泪忍不住扑簌簌掉了下来。

张云逸深知妻儿受苦了，扶着他俩坐下来。

张远之劝道：“娘，你别哭，见到爹咱们应该高兴呀！”

张云逸也劝慰说：“儿子说得好，我们全家团聚了，应该高兴呀！”

张云逸对妻子和子女有着深沉的爱，但是作为高级

领导者，他严格要求自己，没有把这种深沉的爱化作特权。他也严格要求妻儿，教育他们要和群众同甘共苦。

韩碧说：“云逸教子是严格的，他常对我说：‘我们对孩子要严格，丝毫不能使他有任何特殊感。要督促他努力学习，将来革命胜利了，我们党和国家需要有真才实学的人，建造新中国，创造新生活。’”

建国初期，张云逸的小儿子张光东从青岛转学刚来北京时，他不同意孩子舍近求远到条件比较好的学校入学，他说：“这附近就有北池子小学，就让光东和老百姓的孩子一起学习吧！”张云逸送给儿子人生路上的座右铭是：“好男儿自己闯天下！”

乔装除奸

1941年1月4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事变发生后的整整7个昼夜，张云逸和刘少奇、陈毅等新四军领导人彻夜不眠。对国民党顽固派同室操戈、反共媚日的行径万分愤慨，他们时刻注视着事变的发展，用无线电不断向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报告新情况，并想法和被围困的新四军领导人联系，及时给予指导和帮助。

1月17日，蒋介石公然发布命令，取消新四军的番号。为了粉碎国民党顽固派消灭新四军的罪恶阴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针锋相对，于1月20日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同时将华中新四军部队和八路军部队统一编成7个师，其中第二师由江北指挥部所辖部队编成，张云逸兼师长，罗炳辉为副师长，郑位三为政委，周骏鸣为参谋长。



1941, 张云逸(左五)同新四军第2师部分干部合影

一年来，张云逸虽然担任新四军副军长，但主要精力放在主持二师的工作上。

一天，张云逸从第二师师部赶往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盐城开会。在淮(安)、宝(应)县独立团警卫连护送下，来到了戴湾地下交通站，准备从此地通过大运河封锁线。交通站有个叫彭五的交通员叛变投敌了，为防不测，交通站负责人及时通知各交通员隐藏起来，副站长王建高也已隐蔽起来，因此站上无人，而这时，天色已渐亮，处境险恶，怎么办？

护送的警卫战士们为了副军长的安全，建议张云逸先隐蔽起来，待找到王建高后，明天再另外寻找行进路线渡河。张云逸不同意，他对大家认真地说：“待到明天，就赶不上开会了。”他当机立断，决定来个出其不意。他说：“咱们化装渡河，从敌人眼皮底下闯过去。”

经过一番乔装，张云逸和护送的6名警卫战士都打扮成到运河西割草的农民，手拿镰刀和草绳。又几经周折，找到了交通站副站长王建高，弄来一条小木船。这时，天已大亮，张云逸和战士们一起上了小船，王建高划桨，离东岸向西岸驶去。

就在这里，运河堤上由北向南来了十几个敌自卫队员，情况危险万分，张云逸急要王建高把船头调向北划。王建高不解，说，北边是平桥伪军的据点，彭五就在那里为敌人卖命，怎么行？

说时迟，那时快，船头刚刚调朝北，敌自卫队员就在岸上朝小船喊开了：

“船上什么人 到哪里去？”

张云逸让身旁一位操本地口音的战士高声答话：“割草的，到平桥去。”

那伙自卫队员一听是本地人，又是往据点方向去，有点相信，本不再理会。可这时自卫队中一位当官模样

的人却仍不放过这只船，高声连叫：

“把船开过来，我们要检查。”

眼看要短兵相接，警卫连的战士人人手心捏着一把汗，性急的把手伸进腰里准备掏枪。张云逸眼疾手快，一把按住，低声说：

“不要慌，见机行事。”

张云逸要王建高把船靠拢岸，那个当官模样的人头一个跳上小船，后面几个也想跟着上船，王建高忙喊：

“船小，人多会翻的，不能再上了，’并趁机把船往河心荡了荡。

这时，张云逸不慌不忙地从袋中掏出一张纸，在那家伙面前晃了晃，又放回衣袋中，对他说：

“昨天彭五投诚了，根据他的告密，今晚有共产党的重要人物从此渡河，太君要我们化装在这里等候，你来打什么岔？”

那家伙一听到彭五的名字，有点将信将疑：

“你们是哪一部分的？平桥据点里怎么没有见过你们这几个人？”

张云逸泰然自若一笑，答：

“平桥据点的人，这里老百姓全见过，化装了也难遮人耳目，共产党和老百姓是一鼻孔出气，他们会上当吗？”

所以，我们是从淮安连夜赶来的！

停了停，张云逸一转念，又继续说：

“看来你是小队长了，那好，我们正要到平桥去，找彭五当面谈一下，请你给我们领个路吧！事成之后，有你的好处！

说完，煞有介事地朝岸上挥挥手，大声喊道：

“你们先执行任务，他跟我们去平桥找彭五。”

不等答话，小船就离岸一直朝北划去。

岸上的自卫队员往南越走越远，船上的那个自卫队头目还在发愣，忽然一支短枪顶住了他的腰，紧接着一声喝令：

“不许动，动就打死你！”

“那家伙猛吃了一惊，两眼一眨，正想跳水，两臂却早已被揪住，动弹不得。他只好哀声问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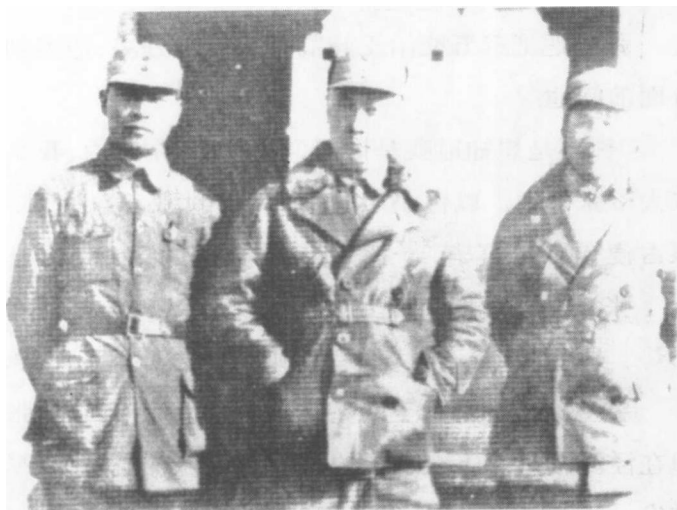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干什么的？”

张云逸说：“别问，等会儿找到彭五，你就知道了。”

于是，由这自卫队头目乖乖领路，张云逸和警卫战士轻而易举地进了平桥，在彭五的姘头家里找到彭五。彭五见是自卫队当官的领路，又听说是淮安太君派来的，来头不小，慌忙连连点头哈腰，递烟倒茶，现出一副十足的奴才相。张云逸强忍怒火，对彭五说：

“不用张罗,太君有令,你先带我们去抓王建高。”

一听说抓王建高,想到自己升官受奖的机会又到了,彭五浑身便来了劲,连忙答应:“行,行!”随后拿了一顶帽子,领着众人出门。



张云逸(右)与陈毅(中)、彭雪枫(左)合影

不一会儿,来到平桥码头,正待上船,彭五一抬头,咦!船上划桨的不正是王建高吗?彭五情知不妙,拔腿就要跑,刚一转身,就被警卫战士踢了个狗啃泥,被反钮双臂押上了船。而那个自卫队头目原来听说要抓共产党,稍有点放心,这时觉得情况有异,忙掏枪报警。张云

逸眼疾手快，一下夺掉了他的短枪，命令道：

“快送我们出镇，不然先要了你的命！”

另一个警卫战士拔出短刀，逼着他上船。

就这样，一行人顺利渡出平桥镇，来到大运河东岸的泾河渡口，上了岸。

张云逸把彭五交给王建高押去就地处决，他走到彭五面前问他：

“你不是想知道我是谁吗？我让你死个明白，我是你张大爷张云逸。以你小小的叛徒，劳我张云逸大驾，你很占便宜呵。”言毕，一挥手，王建高把彭五给毙了。

张云逸又对那个自卫队头目教育了一顿，要他看清形势，支持抗日，不做坏事，否则就和彭五下场一样。

警卫战士押着自卫队头目返回了大运河西岸，张云逸在泾河渡口地下交通员的护送下，连夜往新四军军部进发。

在新四军军部会议召开之时，张云逸准时到达盐城。

领导建立军工厂

皖南事变发生后，华中敌后抗战进入艰苦阶段。

1941年4月30日，根据中央军委决定，组成了新四军第二师军政委员会，张云逸任书记，罗炳辉、郑位三、郭述申、周骏鸣为委员。1942年2月成立淮南军区，张云逸兼军区司令员，郑位三任政治委员，罗炳辉任副司令员，周骏鸣任参谋长。



1942年，张云逸（左五）、陈毅（左六）同新四军部分干部在淮南合影

淮南军区有 4 万将士,队伍壮大了,可是,这些将士的弹药粮饷却没有着落。

一发迫击炮弹是当时农民八亩地小麦产量的价值,而在一次路西战斗中就消耗了 300 多发。战士们吃的困难,每人每天不足一斤粮,三钱油 穿的更是困难,每人只有身上穿着的一套单衣,根本无法换洗。加上国民党、日寇和伪军对淮南根据地的军事进攻、政治破坏、经济封锁,更加重了根据地的困难。

对此,作为司令员的张云逸又怎样思考,怎么解决呢?

他遵照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一边打鬼子,一边搞生产,组织生产自给。

他先领导建立了军工厂。厂房是农家茅舍,条件虽然简陋,但工人们硬是凭着自己的一双手和顽强的战斗意志,创造出了年产 60 万发步枪子弹的成绩。

子弹生产出来了,迫击炮弹也生产出来了,还生产出了地雷。

枪炮的肚皮解决了,人的肚皮更要解决好。张云逸一个命令下去,部队便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开荒种粮、喂猪种菜等活动。

在那艰苦的岁月里,张云逸职务高,年龄大,身体



将新生产的手榴弹装箱运往前线

有多种疾病,但是他带头抬石、开荒、捡粪,样样农活都抢着干。在司令员的带领下,淮南军区生产的粮菜不仅可以自给自足,还支援了其它根据地。

有一次部队开大会,正在台上演讲的张云逸,无意中发发现台下有两名战士从地上捡烟头来吸。这个发现使他心里隐隐作痛,他怨恨自己为什么没有早发现这个问题。

香烟虽不是生活必需品,自己也不吸烟,但作为一名司令员,战士们杀敌立功,连吸支烟都不能满足吗?

淮南的烤烟闻名国内外,但农民生产出来的烟叶却被日伪统治区的客商低价收购高价售出。这样一进一出,淮南烟农受害,我们的资金外流,又使这些身在淮

南的战士吸不上烟……

张云逸心潮翻滚。他又想到，抗日民主政府曾三令五申，限制外烟运进，但因根据地只有一家私营小烟厂，根本不能满足实际需要。而我们无工厂、无香烟，又怎么限制呢？淮南多么需要一个新烟厂啊！

散会后，张云逸找来供给部部长胡弼亮，第一句话是：“我们办个烟厂。”他接着说：“这样，既配合政府开展反对敌人经济封锁的斗争，又能解决干部、战士和人民群众的抽烟问题。”

胡弼亮接受了办烟厂的任务，张云逸司令员当即批给他 42 元淮南票，这便是办烟厂的全部经费。这 42 元钱，当时只是一口猪的价钱。

两天过后，胡弼亮向张司令汇报“厂址选在铜城西街李家长庄，可以马上动工修建。”

这正是大家所盼望的事情，消息传开，干部战士们兴奋得叫起来：

“好哇，一口肥猪变烟厂，保证打好经济仗！”

烟农们听说新四军开办烟厂，都把上不连枝，下不沾土的上等好烟叶送给他们。这种烟叶，味最纯，色最好，每株烟草只有七八片。烟农们乐呵呵地说：“支援军队办烟厂，一片烟叶一片心。”当地妇救会、儿童团也动

员起来，不计报酬来帮助拣烟叶，抽烟筋。

烟厂建起了，很快就投入正式生产。可是，香烟叫什么牌号好呢？大家想来想去，最后，张云逸根据淮南日报社秀才们的提议，定其名为“飞马”牌。秀才们还在飞马牌香烟盒上画了一匹展翅飞腾的骏马。

张云逸高兴地对大家说：“这象征着革命的发展如骏马飞腾，好，太好了。”

金黄色的烟丝很快便被卷起，飞马牌香烟便“飞”出烟厂，“飞”到了前线，“飞”到了集镇。——烟厂收购烟农的烟叶，烟农增加了收入，地方政府增加了税收。

后来，烟厂又发展了四个分厂，分别设在竹镇、古城、盱眙等地。到1945年底成立了天源公司。烟厂越来越大，不仅能自给，而且可以贸易，用它换粮食、换药品、换弹药、换布匹。

飞马牌香烟的制作技术不断改进，质量日益提高。比色、比香、比味、比烟丝、比烟灰，飞马牌香烟压倒了名牌货大英香烟。检验烟丝，大英牌含烟筋在百分之二十以上，其他牌子更多，唯有飞马牌则无烟梗子，一色金灿灿的纯叶。吸上一支，一片芳香，提起飞马牌，烟商们翘起大拇指称赞：“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飞马牌香烟当当响！”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对于飞马牌压倒外

地名牌更是高兴不已。

飞马牌声誉突起，使来自敌占区的各种香烟的地位一落千丈，进口数量由减少而绝迹。同时，敌占区的烟商们冒险来了，四邻的烟贩都汇聚铜城镇。彻夜长明的汽灯，照着络绎不绝的人群，成为夜市。他们在烟厂门口连夜排队，有时竟排起几十人、上百人的长队争购。

由于敌占区封锁得紧，解放区的产品难以出关。张云逸想了个“冒名顶替”的办法。从上海精印了大批大英牌香烟空盒到铜城，里面装上飞马牌香烟，一船一船地顺利装运出去。于是，这匹‘飞马’真正展开了它金色的翅膀，飞遍淮南，一举突破了敌伪对根据地出口商品的封锁，名扬京、沪等敌占城市。

这时，在上海、南京街头，经常能见到烟商们神秘地告诉顾客：

“剥了皮看肉，仔细看看，货真价实的真‘飞马’，这是‘四爷’（新四军）的产品啊！”

新中国成立后，飞马牌香烟驰名全国，饮水思源，说起‘飞马牌’，它还是张云逸大将军的‘专利’哩。

代理新四军军长

为坚持敌后抗战，壮大新四军队伍，从而稳定华中敌后的抗战局面，张逸云非常重视从组织上建党建军。1940～1941年，他创办江北指挥部军政干校（后改为抗大第八分校），为部队及地方培养训练了大批干部，受到陈毅、刘少奇的高度赞扬。

1942年夏，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张云逸专任新四军副军长职务。在这期间，他在第二师组织工作会议上作了《略论组织工作的内容与任务》的报告。强调组织工作是我党我军工作最主要的部分，组织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并关系到军队建设之成败，保证党的政治任务之实现，必须重视人民军队中的组织工作。

他具体论述了组织工作的内容和第二师当时组织工作的任务。指出：军队中组织工作最中心的一环，是党的工作，即健全党委、总支和支部的领导工作。如党的各级组织、党员的发展、党的教育、党的民主集中制实施，连队各种政治组织等。

同时，他还提出，为了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决议在军队中正确实施，为了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我军组织工作的重要一环是正确地挑选、配备干部，要对干部进行了解、审查、培养、提拔。

他认为，治军先治干，有什么样的干部就会带出什么样的部队。要培养、提拔干部，首先要了解干部，不了解就无法培养与选拔，更无法使用。但了解干部不能凭几个人主观的了解，也不能以干部偶然发生的一件事或说的一句话，来判断他好坏，而是客观地系统地从干部的出身成份、斗争历史、党性强弱、思想意识、工作表现以及个性等方面进行全面了解，不仅了解现在，而且了解过去的斗争和将来的发展；其次要加强干部的党性。

党性不强的人，就不能完全站在党的立场上解决问题和处理问题，为做一件事，先要想到对党是否有利，如果有利，任何艰难险阻，都要坚决去做，否则，就是杀头也不做；再次，必须保证党的组织原则的正确执行。

每个组织工作者，都要有高度的原则性，凡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和意识，要坚决展开思想斗争，纠正不良倾向，保证党的思想意志的统一。纪律是革命军队生存和斗争胜利的最根本条件，也是团结统一的根本保证。因此，我们组织工作要有高度的纪律性，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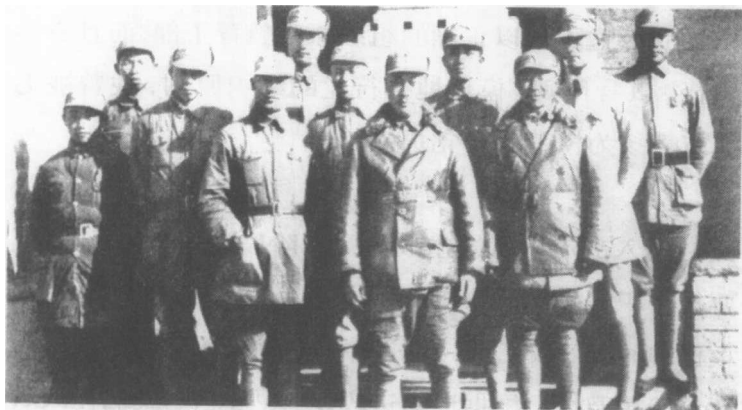
1941年3月18日，新四軍第2師在安徽天長縣趙莊召開政工會議，這是張雲逸（前排左三）、鄧子恢（二排左二）同會議主席團成員合影

張雲逸不僅以正確的組織原則教育幹部，而且身體力行，以身作則，模範地執行黨的組織原則，他曾被毛澤東表揚為模範共產黨員。

進入敵後抗日游擊戰爭第二階段，因情況不同了，要執行積極的戰略防禦。這是因為：①敵人全面戰略進攻已停止，採取了保守其佔領區的方針，因此，敵人对敵後我軍及抗日根據地的進攻是必然的；②我們在敵後發展的任务已基本完成，現在主要是粉碎敵人的“掃蕩”

与‘清乡’，保存与巩固根据地和军队；(3)我们总的任务是继续坚持敌后抗战，全面巩固根据地，聚集力量反攻，这是互相联系的三位一体的任务。

根据上述情况，张云逸认为，在敌我力量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之前，在敌后的战略进攻要有一定限度，敌人的防守也有一定时间性。如果在敌后完全采取战略进攻，就会过早与敌人决战而忘记防御的持久的方针，误入速战速决不切实际的战略论中去。反之，完全采取消极的战略防御，实行退却逃跑，放弃根据地则更是错误的。现在坚持敌后斗争，只有执行积极的战略防御的正确方针，才能完成总的任务。张云逸在报告中还具体阐



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副军长张云逸与一部分干部合影

述了怎样执行积极的战略防御的各方面问题。

他的这些军事观点和论述，对于指导我华中根据地军民粉碎敌伪多次“扫荡”与“清乡”，挫败顽军进攻，渡过困难，积蓄力量，准备反攻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1943年秋，陈毅奉中共中央指示去延安参加整风和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张云逸代理新四军军长，主持新四军的军事工作在此期间，他指导第二师、三师一部的皖东反顽斗争，取得了津浦路西占鸡岗首战歼敌一个团的胜利。

1944年冬，根据党中央和军委的指示，他部署了开辟苏浙皖边区的斗争，由粟裕率部渡江南下，成立苏浙军区，取得了粉碎日伪军多次进攻和三次天目山反顽战役的胜利，扩大了新四军在江南实施战略反攻的前进阵地。

与此同时，张云逸根据中央军委整训部队的指示，领导新四军开展了以提高四大技术为主的军事训练，以尊干爱兵运动为中心的政治整训，为战略反攻的到来实行由游击战到正规战的战略转变作了充分准备。1945年6月，张云逸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9日，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发表声明，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及其

他人民军队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日伪军、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张云逸坚决执行中央的部署，在战略反攻开始后，领导华中军民向日伪军大举进攻，解放县城 32 座，重要市镇 400 余个，歼敌 3 万余人，基本实现了把苏中、苏北、淮南、淮北连成一片的任务。华中战场的胜利，沉重打击了蒋介石勾结日伪军侵占解放区、准备挑起全面内战的阴谋，保卫了华中人民的抗战胜利果实。

攻克淮阴和淮安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云逸仍主持新四军工作。为粉碎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的阴谋，他领导部队抓紧进行自卫战争的准备。1945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和‘夺取东北、巩固华北、华中’的战略方针，以及为实现这个方针所作的具体战略部署，张云逸指挥部队继续肃清敌伪，阻止国民党军沿津浦路北上。

1945年8月24日，毛泽东发出电报，要求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率领新四军“力争占领小城市及乡村，迅速设法占领运河沿线及串场河沿线各城市，将苏中、苏北、淮南、淮北连成一片。”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张云逸决定新四军首先出击淮阴和淮安城，占领这两个苏北的战略要地。

此时，淮阴城内的日军已经撤走，汉奸潘干臣的伪军和保安团，总兵力将近万人。蒋介石的目的很明确，由潘干臣的队伍死守淮阴城，切断解放区间的联系，其

正规军北上津浦路，李仙洲师从东边打过来，把新四军逼出苏北，蒋介石把这个战术叫做“分进合击，有堵有攻”。

打淮阴是一次十分艰巨的攻坚战。城墙上潘干臣修筑有坚固工事，城四周和城门上筑有炮楼，城内各主要路口筑有地堡，护城河与城墙之间设有鹿砦、铁丝网等等。此外，潘干臣大量拼凑反动区乡武装，在城外十余里修筑碉堡工事，形成坚固的城垣防御，潘干臣自诩淮阴城是固若金汤。



按照总部命令向东三省挺进的新四军三师部队

如何攻打淮阴城，张云逸经过再三考虑，决定交给刘震。8月26日，新四军第3师第10旅在刘震的率领下，开始了攻打淮阴的准备。决定：第一步，快速扫清外围

敌人,将城包围 第二步,选好突破口,以有效手段,突破坚固设防,分割歼灭城内之敌。

8月27日上午,10旅向淮阴外围据点发动了全面进攻,敌防御工事被我军一个个突破。到31日晚,我军已全面扫除淮阴城外数十个卫星据点,淮阴成为一座孤城。

潘干臣急电淮安警卫团增援,淮安敌军马上出动,走到板闸时,进入我10旅打援部队的伏击区,一时枪声大作,增援的伪军被迅速击溃。10旅攻打淮阴第一步取得了胜利。

刘震向军部汇报了攻打淮阴城的战况。张云逸给第3师第10旅发出了贺电,并对攻打淮阴城作出具体指示:其一,选择最有利的时机和突破口,要做到突然而又迅猛;其二,攻城要有充分的准备,包括兵力、战术和器材;其三,架设越过护城河的浮桥,或设法将河水疏导出去。

刘震看完电文,对张云逸如此周密的部署十分惊叹,对部下说:“胜之用兵惟谨慎,焉能不胜之!”

为确保攻占淮阴万无一失,张云逸又电令第3师另一部在津浦路狙击敌人援兵的来路,电令第4师对李仙洲的部队进行有力的牵制,以使淮阴之敌完全陷入孤军

作战的绝境之中，以利我军进行全歼。

按照张云逸的部署，刘震命人对淮阴城外的地形作了勘察，随即又动员了大批支前的民工挖通了一条长达30多里的导水渠道，直达淮阴城下。

9月5日，潘干臣登上淮阴城头，翘首盼望援兵的到來通往淮安的大道上，空空荡荡，连个人影儿也不见。哀叹之余，蓦然发现护城河的水正顺着一条新开掘的渠道，悄然流向远方，河水在不断地减少。

潘干臣赶快吩咐部下“快去人给我堵住！”

刘震还命战士们暗中掘进一条通往城东门的地道，一口装满炸药的大棺材由8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抬起，放到了城墙的炮楼底下，随时准备点燃炸掉敌人的炮楼。

9月6日黎明，隐蔽在淮阴城四周的新四军火炮一齐怒吼起来，为了迷惑敌人，新四军的炮火时紧时松，时疏时密，持续了一个上午。守城伪军开始很紧张，但等了半天，仍是如此，敌人觉得新四军是例行炮击，便渐渐松懈起来了。6日下午2时，刘震下令总攻立即开始，敌人才感到新四军炮火的厉害。

首先冲锋的是师特务团和一支队。十几个视死如归的新四军战士，推着一辆板车，车上装着一枚重磅大

炸弹，冒着弹雨向南门冲去。这枚大炸弹，原是日本飞机投下来的，没炸，战士们想把它推到城门下，引爆它。

敌我双方的机枪都在怒吼，几个推车运炸弹的勇士相继倒下，又有几个勇士扑上去。板车，终于被推到了南门下，一个身负重伤的战士点燃了引信，但炸弹未能引爆。特务团团长郑贵卿当机立断，大吼道：“强攻！”战士们呐喊着冲上去，攀着云梯冲上去。

激战之中，一架架云梯被打断，一批批英勇的新四军战士倒下去。特务团七连五班长徐佳标身负重伤，他在昏迷中被爆炸声震醒，咬紧牙关挣扎着向敌人的碉堡爬去，一步一步地接近。战友们发现，他猛地一跃而起，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堵住了敌人的枪眼，敌人的机枪顿时哑了。郑贵卿挥泪大喊：“为徐佳标报仇，冲啊——！”战士们杀向敌碉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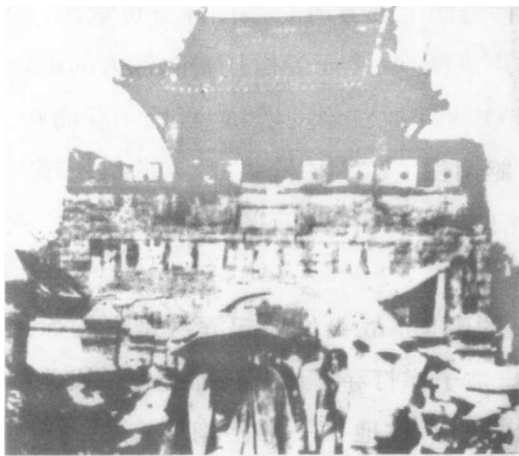
摧毁了敌人的碉堡，战士们抬起浑身是血的徐佳标，只见他的胸口被子弹打穿了十几个血窟窿。战斗结束后，徐佳标献身的所在地——淮阴南门，被命名为“佳标门”。张云逸在悼词中说道：“佳标同志，你没有死，你的精神永远长存。”

南门尚在酣战之中，忽地从东门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这是主攻东门的二、四支队引爆了那口大棺

材,东北角的城墙被炸开了 7 米多宽的缺口,城上的一个敌炮楼被炸得飞上了天,一个排的守敌全部葬身于爆炸声中。

黄昏时分战斗结束了。新四军战士押着一群群俘虏们,集中到伪师部附近的大操场上,伪师长潘干臣被击毙。

淮阴城头,飘起新四军的大旗,第 10 旅大获全胜。



1945 年 9 月 22 日,新四军部队解放淮安县城

消息传到第 7 旅和第 8 旅,官兵们士气大振直奔淮安,淮安一仗,也打得十分漂亮,22 日攻下了淮安城。

9 月 21 日,新四军军部和中共中央中

华分局由淮南的千棵柳迁到淮阴县城,从此占据了更为重要的战略要地。

两淮战役打乱了蒋介石在华中的部署，蒋介石加紧抢占大城市。9月初，南京、上海、徐州、蚌埠等城已被国民党军队相继占领。

占据徐州的蒋军，准备北犯济南；占据蚌埠、浦口的蒋军，图谋北上，互相勾结，准备两线开花，打通津浦线南北通道。

蒋介石图谋将徐州、蚌埠、浦口连成一线，再一次分割解放区。张云逸领导新四军的三、四师主力，在9、10月间彻底破坏了津浦路徐宿段和浦滁段，连续攻克9个车站，歼灭伪军1000余人，挫败了蒋介石分割解放区然后各个击破的图谋。接着，他又率领2万余名新四军官兵包围了盐城，迫使守军投诚。随后，他又挥师进攻高邮，迫使城内的守军投降。至1945年12月底，华中解放区内残存的日、伪据点被全部扫平。

跃马鲁南

1946年1月7日,中央军委命令新四军部和山东军区合并,以便统一指挥华中和山东的军队作战。新四军军长陈毅兼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副军长张云逸兼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张云逸在山东

同年2月,张云逸去了延安,一个月后返回山东,并带回了一批干部。蒋介石集团不断破坏和平谈判和停战协议,准备发动大规模的内战。摆在陈毅、张云逸等人面前的任务十分艰巨,他们一方面要领导广大军民开展大练兵运动,准

备随时粉碎国民党的军队向解放区的进犯以扩大和巩固解放区，另一方面还要发动广大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开展大生产运动，生产自救，巩固后方。

4月16日，新华社发表了张云逸的文章，强烈谴责国民党军队所犯下的一系列罪恶行径：国民党军队不断肆无忌惮地进行武装挑衅，仅在山东境内就向我军进攻180多次，并且在我解放区占领了400多个村庄，这种行为必将遭到人民的反对

1946年6月，国民党30万大军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全面内战爆发。

同时，国民党军队对我山东解放区也发动了大举进攻。6月21日，敌54军由青岛沿胶济路向西进攻；7月5日，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王耀武又从济南沿胶济线东犯。敌青岛、济南对进，以潍县居中策应，企图半个月打通胶济路。

面对敌人的大举进攻，张云逸命令胶济路沿线各部队，尽力拖住、牵制敌人，寻求战机坚决消灭之。经过两个月的战斗，歼敌7300多人，有力地配合了华东野战军的南线作战。

此后，张云逸主要负责组织和建立地方武装。对这一工作他有十分明确的认识：如果没有坚强的地方武装

配合，要取得自卫战争的胜利是极端困难的。因为从兵员、物资的供应，主力转移及配合主力外线作战都少不了地方武装。

在张云逸的组织领导下，山东解放区人民群众踊跃参军参战，地方武装发展迅猛。人民群众纷纷参与到“保田，保家，保饭碗”；“到前线去，到主力去”；“反蒋保



张云逸(前右一)同陈毅(坦克上左二)等在鲁南战役中缴获的坦克前留影

田，杀敌立功”中去。

鲁南战役后，张云逸领导的地方武装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敌第26师及第一快速纵队由山东峄县向临沂进攻，而我军主力集中于苏北、淮北，鲁南我军兵力不足。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遵照中央指示，将主力北调，歼灭鲁南之敌。

在1月2日战役发动前夕，华野主力尚未到达预定目标，而敌军向临沂进攻。张云逸指挥鲁南第三军分区的地方武装和民兵，在郯城县码头镇、新村一线，沿沂河东岸进行防御，保证了主力北上侧翼的安全。他们首先破坏了临枣路全线，造成国民党军队增援的困难，接着占领了卞庄河大桥，冒着风雪守卫了7个昼夜，保障我军顺利通过。当敌人到来之际，便炸毁了大桥，敌第一快速纵队的坦克、汽车被阻于河岸。随后卞庄西南30里的大小桥梁22座，全部被炸毁，敌退路被切断。1月3日，第一快速纵队就被我军全歼。

同时，民兵爆炸队在敌必经之地，大摆地雷阵，阻击敌人。滨海高广珍爆炸队在前线敌必经路上炸掉敌军车两辆，在一座桥梁旁埋“飞雷”一群，当场炸死过桥敌军12名，鲁南地方武装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的作战，鲁南战役取得辉煌的胜利，共歼敌5万余人。

巧施“空城计”

鲁南战役之后，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并入华东局，将新四军军部改为华东军区机关，华中和山东两支野战军合编为华东野战军。陈毅担任华东军区司令员、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饶漱石担任军区政治委员，张云逸担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黎玉担任华东军区副政治委员，粟裕担任野战军副司令员，谭震林担任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华东军区的军事工作，主要仍由张云逸负责主持，继续领导地方武装配合野战军作战。

1947年1月底，蒋介石又调集53个旅共计31万人的兵力，由陈诚亲临徐州督战，力图在临沂地区与华东野战军决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二陈决战。

陈毅、张云逸、粟裕等人经过研究，一致认为：目前，蒋介石集结在南线的重兵正稳步向北推进，而北线的李仙洲集团主力已经孤军深入莱芜地区，我军应该改变原来在南线分割歼敌的打算，去打李仙洲，打一场歼灭战。

张云逸建议：“我们应该唱一场‘空城计’——舍临沂而取莱芜，这样才可能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

陈毅、粟裕十分赞同张云逸的建议。

陈毅命令除留一部分兵力在南线牵制敌人外，主力部队立即撤出临沂城，隐蔽北上莱芜。张云逸随即对城内军民疏散、转移，一夜之间城墙被拆除，水井被掩埋，粮食被埋了，机场被破坏了，次日全城大转移，百姓带上许多生活用品，能带走的都带走了。

野战军主力离去之后，民兵队伍和老百姓于2月15日开始出城，男女老少有组织有秩序地离开了临沂。张云逸动员广大军民：“乡亲们，不要难过，不要怕打破坛坛罐罐，等打垮了‘刮民党’，咱们再好好建设吧！”在张云逸指挥下，2万多军民悄然撤走了。



莱芜战役前，三野某部向莱芜挺进

为了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张云逸指挥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在山东地区展开了规模空前的破袭战。一次,民



李仙洲

兵一夜之间破坏了胶济线 100 多公里铁路,敌援兵从青岛赶来,火车行至半路便无法前进了,大破袭一连进行了 7 个昼夜,参加的民兵多达 10 余万人。毁路炸桥,割电线,埋地雷,使得敌人寸步难行了。

2 月 20 日至 22 日,华东野战军主力突然进入莱芜地区,将李仙洲的第 46 军和第 73 军团团围住。

与我党有密切联系的第 46 军军长韩练成临阵放弃指挥,使整个部队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使李仙洲慌了神,乱了阵脚,他命令部队:“给我死守住阵地,不准后退 违令者——杀!”阵地上的敌军,在鲁战队的威逼下负隅顽抗,一时间敌我双方形成了对峙的局面,战斗进

行得十分艰苦而激烈。 23 日,莱芜大战结束了,华东野战军一举歼灭敌人两个军,计 5. 6 万余人,加上其他方向的战斗,莱芜战役总共歼灭敌军 7. 6 万多人。李仙洲和另外几个高级将领也被生俘了,华东野战军创造了一次歼敌 7 个师的范例。

指挥支前大军

1947年5月上旬，国民党军队向我鲁中解放区发动进攻，企图迫使华东野战军撤往黄河以北，或者在鲁中山区与之进行决战。汤恩伯以整编第74师为主力，命两个师分别在两翼起保护和协助作用，他们以沂蒙公路上的坦埠为主要攻击目标，向我鲁中解放区进攻。

陈毅、张云逸、粟裕等野战军领导果断地率领主力部队后退，集结在莱芜、新泰、蒙阴以东地区捕捉战机。5月11日，汤恩伯敌整编第74师从蒙阴东南地区向北推进，与两翼部队之间无法配合，出现了孤军深入的局面。

陈毅、粟裕抓住这一战机，命两支纵队分别插入第74师与其左右两翼的接合部，断其联系，配合正面两支纵队的攻击，另以一支纵队切断74师的退路。从13日起，第74师被华东野战军逐步压缩在孟良崮一带。

激战之际，张云逸指挥的支前队伍带着粮食、弹药，冒着敌人的炮火奋勇向前，队伍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

有身背的，有肩扛的，有独轮车推来的，有挑着担子送来的，也有牵着牲口驮来的，汇成了一股人民支前的洪流。



敌军为切断我军后勤供应，出动飞机轰炸我支前大军。敌机对准山路一架接一架俯冲下来，机关炮打出一串串烟尘，许多人负伤或牺牲。受惊的骡马驮着口袋狂奔，草木和石头被落下来的炸弹炸得飞起来。就在这危急之际，张云逸出现于支前队伍中，高喊：“乡亲们不要慌，赶快卧倒隐蔽好，有枪的向敌机射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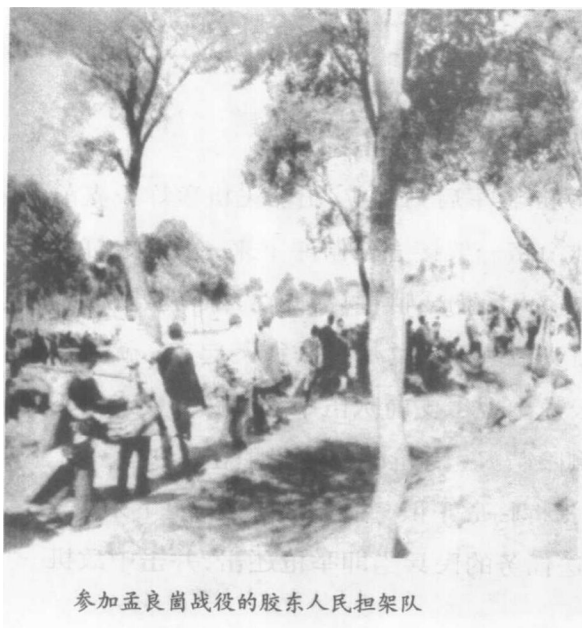
支前总指挥临危不惧，乡亲们随即安定下来了。几十名担任护送任务的民兵当即举枪还击，并击中敌机一架。

几十万支前大军,冒着敌人的炮火,不怕艰辛、不顾生死地奔赴火线,他们给野战军运送食物和弹药,有时还直接参加战斗,保证了战争的胜利。

孟良崮之战进行了三天,敌整编第74师被彻底消灭,师长张灵甫被击毙。

进犯华东的国民党军队经过40天的休整,又以32个旅24万余人向鲁中地区发起攻击。7月1日,华东野战军两路出击,奔往鲁南和鲁西去抄敌军的后路,又在

沂水、悦庄公路两侧展开大规模的破袭战。到中旬,迫使敌人7个整编师不得不狼狈西撤,其进攻鲁中的计划也随之破



参加孟良崮战役的胶东人民担架队

产。在这些战斗中，张云逸所指挥的支前大军保证了我军的后勤工作，对战争的胜利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从7月至9月，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陈毅、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主力直扑中原，转战鲁西南，并于9月7日打响了沙土集战役。

战争需要的大量作战物资，供应前线作战，张云逸和他率领的支前大军又出发了。

年底，华东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着重研究节约支前问题。张云逸在发言中强调：大后方必须精简编制，清理资财，压缩供给标准，坚决反对本位主义和贪污浪费，尽最大可能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以支援前线。他的主张，立即得到与会人员的拥护。

张云逸自己率先垂范，体弱多病的邓子恢等领导人，都不顾大家的劝阻，取消了小灶伙食和其他优待，以极尽全力保证前方的供应。

人民解放战争需要源源不断的兵员补充，通过思想教育，动员群众参军，并着重在家庭劳力较多、困难较少的青壮年中选拔战士。

由于扎实而细致的工作，群众纷纷表示：“冤有头，债有主，不打倒蒋介石，这笔血债永远算不清。”有不少群众甚至集体杀鸡明誓：“上有天，下有地，面对领袖毛

主席要伸冤,要报仇,坚决打倒蒋介石。’于是很快形成自觉报名参军的高潮。

在粮食支援前线上,1947年后,由于作战部队和支前民工的增多,吃粮人数剧增,仅靠地方粮食机关供应难以满足需要。张云逸等便建立了随军粮站,其基本任务是统一接收地方及后方运来的粮食,再统一供给部队。



人民解放战争进行了两个多年头后,转入了战略决战,战略决战的标志就是攻取敌人层层设防的济南。济南战役打响之前,摆在张云逸面前的最艰苦的任务,就是如何解决前线将士的吃饭、穿衣问题,以保证我军的

物资供应

在攻济战役开始前，张云逸视察了攻打济南的部队时，看到指战员们吃穿都很困难，他决心在 10 月前，基本上解决前线官兵们的衣食问题。在那战争的日子里，人们经常看见这位年逾半百的副司令带一支人马驰骋在解放区的乡村、田野，征军粮、收征衣，以保证部队的供应。

当看见一位大娘将自己的棉袄拆开，掏出棉絮正往还没缝好的军衣里塞时，张云逸不禁热泪纵横。当拿起一位绣有‘杀敌立功’的军鞋时，张云逸深情地说：“在江西老区，乡亲们把它称做‘量天尺’，我们就是要用这样的尺子，一步一步地量完中国大地啊。”在解放区人民的全力支持下，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制做棉衣的任务就提前完成。

9 月 16 日，济南战役开始了。为了保住这块连结津浦、胶济两条铁路的战略要地，隔断华北、华东解放区的联系，蒋介石命王耀武以 10 万余人的重兵固守济南，其徐州地区还集有援兵 17 万人。华东野战军以 14 万人攻城，另以 18 万人打援。

战斗异常激烈，激战 8 日之后，济南战役结束。被活捉的王耀武望着从四面八方拥进城的战士、民兵和民

工，一时惊呆了。见了陈毅和张云逸时第一句话就是：
“王某此次战败，因为你们的人太多。”

“啥子太多 简直是乱说！”陈毅道。王耀武用手指着那些推小车的、抬担架的、牵骡马的、扛着土枪跟在野战军队伍后面的人。张云逸不禁开怀大笑：“你说的是这些老百姓吧 哈哈，这就是我们的援兵，源源不断的援兵啊。”

11月6日，淮海战役开始。淮海战役，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薛城），南至淮河。在如此广大的地区，敌方投入的兵力将近80万人，而我方投入的兵力大约60万人，在江淮之间展开了惊心动魄的大决战。

战争需要足够的后勤保障。时值初冬，张云逸披星戴月、顶风冒雪奔波在千里运输线上，率领11万民工昼夜兼程，为华东、中原两野战军和地方部队运送粮食、弹药、冬衣，上火线抬伤员或是直接参战。遇到需要之时，往往是人歇马不停蹄。

张云逸曾感叹道：“山东老乡有句俗话，叫做‘腿肚子绑灶王，走到哪吃到哪’，不论是官还是民，一块干粮一壶水，风雨里吃喝大路边睡，可真是风餐露宿啊！”

11月6日至22日双方打得异常激烈、艰难，是淮海

战役第一阶段，华东野战军以七个纵队分割、围歼黄百韬兵团。与此同时，国共双方的供应战也打得难解难分，敌方的运输队来了，一辆又一辆的大卡车风驰电掣，可是他们跑不到运河西岸，就在半路上被伏击的部队和民兵打掉了。我方的运输队来了，牵着牲口的，推着小车的，肩挑背驮的，在敌机的轰炸下义无反顾地前进，在运河边，民工们在冰冷的河水中连夜架起浮桥，让运



中原人民支援我军的架子车队，把弹药送往前线

输队火速赶到运河西岸去，及时把粮食、物资送到前线。

为了提高运输效率，运粮民工车车超载。泗水县运输团，一次接受6天内运送9万斤粮食的任务。在途中，敌机狂轰滥炸，许多民工牺牲了，但他们还是忍饥耐寒，

破冰渡河，胜利完成了任务。

巨野民工有一次运粮，先用大车装载，但不巧的是天陡降大雪，道路泥泞，车不能行。他们只好改大车为小车，雪下得更大了，天地一色。于是，他们又组织了一万多群众用肩挑，用人抬，终于提前超额完成了任务。

有一天，张云逸骑马赶到运河边，发现一支来自鲁南的运输队正在小憩，民工们一个个衣衫褴褛，瘦骨嶙峋，疲惫不堪，他们席地而坐，啃高粱饼子，嚼红辣椒，喝混浊的河水。张云逸问：“是累的饿的吧？”那几个小伙子点了点头。张云逸说：“车子上有粮食呀，你们拿一点煮了吃吧。”小伙子们相互看看，又笑着摇头，都说不能吃，这粮食是打仗用的。两天一夜，他们只吃了一顿饭，而车上的面却一点未动。

几十万支前大军，就这样在张云逸的率领下，克服了许多令人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迎来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的最后胜利。回忆淮海战役，陈毅曾深情地说：“淮海战役是老百姓用手推车推出来的，而这支手推车的队长就是张云逸。”

1948年11月，华东地区的野战部队统一整编为华东野战军，1949年1月又改为第三野战军，同时按地区建立各级军区，华东军区为一级军区，下辖山东军区等

二级军区张云逸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山东军区司令员，继续在后方主持华东军区和山东军区的军事工作

1949年1月，在山东省五莲县，张云逸主持召开了一次支前工作会议，总结了解放战争以来我军支前工作的经验和教训，表彰了那些屡立功勋的民兵、民工组织和个人说到动情处，他竟然站起身，向来自山东各地的支前代表们敬礼，十分恳切地说：“请各位回去后，代我向父老乡亲们亲道一声谢吧。就说，我张云逸感谢父老乡亲们这些年来的大力协助和奉献啊！”顿时，全场响起一片激动的掌声。

接着，张云逸又提出一个更加鼓舞人心的目标，他说“同志们，历时142天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已经胜利结束，中国人民解放军下一步的战斗任务是什么？是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面对如此喜人的形势，我们能不振奋斗志、再接再厉吗？为了更好地完成支援前线的艰巨任务，我们必须筹集5万万斤粮食，征集10万名新兵、10万民兵，还有各种相应的运输工具。总之，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一切保障前线的胜利！”

1949年3月5日，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会后，张云逸赶回山东，向华东军区的广大军民传达这次全会精神。4月21日，人民

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

渡江作战，山东解放区虽距战场远，但仍担负了大批随军常备民工的动员和粮煤等物资供应的任务，他们全力载着大批支前物资，欢欣鼓舞的“推着小车下江南”。据统计，渡江战役华野使用的随军民工由山东、苏北、皖北三个地区组成，共 17 万人。其中，山东有 6 万余人。渡江战役中，百万雄师以木帆船为主要的航渡工具，而划船的任务很多由支前民工承担下来。正是千百万人民的参军、支前，才保证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而人民是需要组织的，张云逸就是最重要的组织者之一。

主政广西

人民解放战争，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向前发展。到1948年底，蒋介石用以发动反革命内战的主力基本上被消灭。人民解放军在质量上和数量上都已占了优势，中国革命的胜利已经为期不远了。1949年4月，我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向一切尚未解放的地区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大进军。人民解放军所到之处，敌人望风披靡，人民欢声雷动，蒋家王朝迅速土崩瓦解。

随着人民解放军向华南的大进军，广西即将解放。为了做好迎接广西解放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共中央于9月22日，就广西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的人选和着手筹建广西党政军领导机构问题，给华中局、华南局发出指示。中央决定以张云逸为首组建广西的领导班子。

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张云逸以华南解放军首席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会议并在开幕会上讲了话。这次会议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了中央人民政



1949年6月，张云逸（前左）作为华南解放军的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

府委员会。张云逸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后又被任命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0月1日，张云逸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随后，他根据中央指示，加紧进行筹建广西的领导机构和迎接广西解放的各项准备工作。

在彻底摧毁旧的国家机器之后，要管理好建设好人民的新广西，必须有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因此，干部问题是当时亟待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由于革命形势

的迅猛发展，新解放的省份很多，各个省都需要大批的领导干部为了解决广西的干部问题，张云逸根据中央的指示，一方面向华东局、华南局求援，调一批干部到广西去；另一方面自力更生，从广西的地下党和游击队中选拔干部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后，他即到上海、武汉、南昌、广州等地，争取了一批原红七军干部、广西籍和兄弟省的干部到广西去。

衡宝战役结束后、在我军即将向广西进军的时刻，张云逸遥望南疆，心潮澎湃。回顾 20 多年他和邓小平等一起在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情况下，以大无畏的精神，领导了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和右江根据地，点燃了广西革命武装斗争的星星之火。如今，20 年过去，神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广西即将获得解放，受苦受难的广西各族劳动人民将要成为新中国的主人。当年红七军奉命北上时，他曾经对右江的乡亲们说：“我们一定会胜利回来的！”现在这个 20 多年前的心愿，马上就要实现了，想到这里怎么不叫他万分喜悦和激动呢？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六个军和第二野战军三个军，按照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于 11 月 6 日发起了广西战役。我入桂部队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全部、干净、彻底地消灭一切

敢于顽抗之敌。11月27日至12月2日,桂系白崇禧部主力被歼于博白、陆川地区。11月22日桂林解放,12月4日南宁解放,12月12日五星红旗插上了镇南关(现为友谊关),广西全境获得解放。从此,揭开了广西历史的新篇章。广西城乡一片欢腾,各族人民载歌载舞欢庆自己的翻身解放。

12月初,张云逸带领一批干部从广州进入广西的梧州,随后不久到达南宁。

刚刚解放的广西,满目疮痍,土匪猖獗,社会混乱,百业凋敝,人民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为了有效地打击敌人的破坏和捣乱,巩固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恢复和发展生产,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休养生息,张云逸同进入广西的其他党政军负责人一起,依靠广西各族人民,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采取了一系列正确、有力的措施,使广西的局面迅速发生了变化。

在人民解放军摧毁了桂系军阀的反动统治机构之后,以张云逸为首的中共广西省委,即在桂林、柳州、梧州、南宁等城市建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1949年底至1950年2月,广西党、政、军领导机构正式建立。张云逸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广西省政协主席等职。在张云逸的领

导下,各市、县、区、乡的人民政府,也都在同一时间内陆续建立。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广大群众开展清匪反霸斗争,没收官僚资本,建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基础,打击不法资本家的投机倒把活动,恢复和发展了生产,广西的社会秩序很快趋于稳定。

张云逸在主持广西工作时,继承和发扬了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进入广西前,他一再对有关负责干部强调,我们到广西来的干部和部队,一定要同广西的各族人民团结好,同广西的地



1949年,张云逸奉命率领一批干部赴广西工作。
这是张云逸(前右)南下途中向干部战士了解情况

下党、游击队、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各阶层的群众团结好。到广西后不久,他亲自召开工人、农民,和少数民族代表的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亲自同民主人士李任仁、陈此生等会见,召开各界代表座谈会,同他们道研究有关广西革命和建设的重要问题。

为了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各阶层人民的意见,做好工作,在张云逸的领导下,1950年,广西先后召开了省、市、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各级各部门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调动了广西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积极性,密切了人民政府同群众的联系,增强了民族团结,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

正当广西各族人民欢庆自己的解放,满怀信心地为美好的未来而斗争的时候,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土匪武装,向人民杀过来了。当时,广西匪情极其严重,除了大量的地主土匪武装外,还有桂系头目白崇禧在广西解放前夕部署留下的3万名正规军。这些反革命武装同台湾、香港和美蒋反动派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盘踞着山区和偏僻的农村,继续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1950年初,土匪在恭城暴乱,杀害我干部、群众350余人。土匪在玉林暴乱,杀害我干部、群众达500多人。

面对猖狂的匪乱,张云逸义愤填膺。他主持召开省

委和省军区会议，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确定 1950 年以“清剿匪特，巩固治安，发动群众，作为全省部队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人民解放军驻广西部队，积极投入剿匪斗争经过几个月的全面清剿和开展政治攻势，剿匪斗争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到 1950 年 6 月，基本上将土匪暴乱镇压下去

朝鲜战争爆发后，广西的土匪又猖狂起来。他们发动暴乱，杀害人民，破坏交通，抢劫物资，焚烧房屋，妄图同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里应外合，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根据严重的局势，张云逸召开干部紧急会议，研究敌情，制定计划，调兵遣将，决心给匪徒以沉重的打击。

在剿匪的日日夜夜，张云逸居住的南宁市桃源路五号气氛十分紧张。每天，各地来的电报一封接一封，电话铃声不绝于耳，广西党政军领导同志陈漫远、莫文骅、李天佑等进出频繁，日夜开会。在张云逸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幅特大军用地图，上面有他标出的圈圈点点和箭头他时而看地图，时而沉思，经常工作至深夜。

经过广西驻军近一年的战斗，剿匪工作取得了很大胜利。到 1950 年 11 月，全省共消灭土匪 11 万余人，但剿匪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全省尚有土匪 5 万余人。

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广西的剿匪工作十分关注。

1950 年 11 月发出指示：要求在 1951 年 5 月 1 日以前彻底肃清广西全省股匪。

张云逸坚决贯彻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了省委第三次高级干部会议。他在会上作了《为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在半年内肃清全省股匪的任务而斗争》的



1950 年秋，越南胡志明主席访问莫斯科后途经广西回国。张云逸（站立者）在南宁设宴欢迎贵宾

报告。报告总结了剿匪工作的成绩和经验教训，分析了全省股匪还没有消灭的原因。对执行剿匪政策中出现的一些偏差，代表省委进行了自我批评，对肃清全省股匪的任务进行了部署。

会后，全省军民群策群力，为消灭全省股匪而斗争。

人民解放军集中优势兵力，选择土匪盘踞的主要区域，组织了强有力的进剿，很快取得了成效。到 1951 年 5 月 1 日以前，胜利完成了消灭广西全省股匪的任务。

从 1949 年底到 1952 年，张云逸是广西的党、政、军的主要领导人。在主持广西工作期间，他同其他负责同志一起，坚决贯彻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团结广大干部和各族人民群众，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共同努力，取得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各方面工作的重大胜利，使广西的面貌在短短的两三年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享受元帅待遇的大将

长期的艰苦战斗生活和紧张的工作，使得张云逸身体衰弱，最后积劳成疾。1952年春，他感到力不从心，终于卧病在床。4月3日，张云逸收到了毛泽东的亲笔信：

云逸同志：

三月四日的信收到了。病况甚为系念，宜注意充分休养，可作半年休养计划，以便安心调治，不为工作所牵挂，待病全好后再恢复工作。

此复。即祝健康！

毛泽东

张云逸手捧来信，不禁老泪纵横。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如此关心，给饱受病魔折磨的他带来无穷的信心和力量。

一直守候在身旁老伴韩碧看了信，也流下了热泪，她说：“主席劝你好好疗养一下，你怎能不听话呢？这么多年来，你南征北战，枪林弹雨，总算有幸活了下来，可都落得身病，解放了，工作起来还是不要命，看在

老婆、孩子的份上,我求求你去疗养一下吧!”

张云逸走到韩碧跟前,紧紧握住她的手,深情地望着她说:“这些年,你为我操了不少心,这个难道我不知道吗?但是党中央把广西的担子交给我,我能不竭尽全力吗!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来之不易,打江山难,保江山更难。我不努力,有愧于千万牺牲的战友和群众,有愧于党和国家啊!”

韩碧点了点头,泪水止不住滴落在地板上。一对革命的老夫妻,为革命、为建设做了多少牺牲!在革命的艰苦岁月,他们没有落泪,在建设的紧张日子里,他们没有落泪,而今,面对领袖的一纸书信,他们却落泪了。

许久,张云逸松开韩碧的手缓缓说道:“现在广西各项工作已步入正轨我在近期内把工作交待安排一下,就遵照主席的指示抓紧治病、安心休养!”

1953年春,张云逸从苏联休养回到祖国,根据党的安排,他留在中央工作。1955年9月,他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衔授勋典礼和国务院授予军官将军军衔典礼。

当周恩来将烫金的大将军衔状授予张云逸时,张云逸双手接过,良久不语。在此之前,他已数次向中央军委打报告,说自己年事已高,工作不便,要求改授他人。

他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得到了军委领导的称赞，但这个请求却没有得到批准，为此，他感到忐忑不安。

在所有授衔的大将中，张云逸是年龄最大的一个。本来，按照授予条例中规定的开辟革命根据地、创建人民武装的条件，他完全有资格被授予元帅军衔。但由于中央已对人数做了限制，所以他被授予大将军衔，但享



1955 年授衔时的张云逸

受元帅待遇。对此，毛泽东曾做解释说：“张云逸同志在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情形下，以大无畏的精神，领导了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南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功勋卓著，受之无愧！”

张云逸身着大将军服，佩带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回首半生征战生涯，心潮起伏难平。对名利他一贯看得很淡，但这勋章和奖章所意味的不是

名利，而是比名利更高更宝贵的东西——荣誉。这是我们伟大祖国和祖国人民给予自己的英雄儿女的崇高荣誉，这代表着国家和人民对于自己的英雄儿女的深切感谢！

英名永彪史册

张云逸的晚年虽然体弱多病，但他始终保持着一个共产主义者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质，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他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把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张云逸对共产主义理想坚信不疑，对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贯彻。在战争年代，为了革命的胜利，他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在和平建设时期，他为了人民的利益忘食废寝，不辞劳苦。60年代初期，他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身体又不好，但他仍然认真负责地去履行自己作为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中央监委副书记的职责。每年他都要到基层去视察工作，调查了解社会的实际情况，写出调查报告，供中央有关部门参考。在视察中，他时时想到人民的利益，及时向有关单位提出工作建议。

一次，他到柳州市郊一个农场视察，看到这个农场从国外引进一批优良的种牛，他就以商量的口气，向农场的负责同志说：“你们引进这批种牛很好。如果你们



张云逸(左一)参观连队荣誉室

也能为周围的农民培养一些优良品种，为他们办一点好事，就更好了。这样他们的生产就会发展得更快，你们国营农场也就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农场负责人听后，连连点头称是。

他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注意倾听群众的呼声。张云逸在广西当省主席期间，来访来信的人很多，他对人民群众的来访、来信十分重视。有的来访者他亲自接待，有的来信他亲自答复，相当一部分的来访、来信的处理，则由工作人员负责。他交待有关工作人员，对人

民的来信的答复要及时，语气要谦虚、诚恳；对每个来访人的姓名、所谈的问题要认真记下来，然后要研究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对某些来访者反映的情况，他听取汇报后，又亲自再接待一次。由于这样，当时许多人反映的问题，都得到比较妥善的解决。

他平易近人，待人热情诚恳。张云逸是身经百战、功勋卓著的党的高级干部，但在他身上却丝毫没有领导干部的架子。相反地，他总是以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人民的公仆的面貌出现。他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直保持着平等的同志关系。他对秘书、参谋、警卫人员及勤务员，从不直呼其名，总是称某某同志。警卫班有个叫刘英桥的小战士，1960年参军，常跟张云逸在一起。张云逸从不叫他“小刘”，总是称“刘英桥同志”。

他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不谋私利。张云逸对同志们的关怀备至，慷慨解囊，而他自己的生活却是非常俭朴的。他对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的丑恶行径深恶痛绝，他的饭食常常只是一些馒头、素菜。一位新来的警卫员看到后，惊奇地说：“首长吃的怎么这样简单呀！”他的衣服都是穿了多年缝补过多次的旧服装，只是在外出办事时，才穿上比较好一点的衣服。他使用的一个公文包，是抗战时期的战利品，已经很陈旧了，秘书建议换

一个新的，他坚持不换。他在南池子的住房，已经破旧不堪，秘书提出要向上级反映换一换房子，也遭到他的拒绝。窗子坏了，窗帘破了，沙发烂了，秘书建议换一换、修一修，张云逸也不同意。他说：“现在我们的生活比农民好多了，还要什么再好的呀；窗帘，沙发布我们自己洗一洗、缝缝补补就行了，买新的国家要花很多钱。”直到1972年，军委管理处的同志看到房子非常危险，再不修理不行了，这样才修理了房子。

1974年，是张云逸大将革命生涯的最后一年。

5月，他的病情加重，行动不便，呼吸困难。

为了挽救张云逸的生命，保证治疗效果，周恩来亲自批示：安排张云逸住进日坛医院。

张云逸病重的消息在老同志中传开了。

叶剑英走进张云逸病房，宽慰病人沉重的心。谭震林走进病房，紧握张云逸的手。韦国清带来广西各族人民对他们的首任省主席的问候。莫文骅带来了红七军所有老战士对他们的老军长的良好祝愿。

1974年11月初，在张云逸病重弥留之际，刚刚恢复工作不久的邓小平来到张云逸病房。邓小平紧握着张云逸的手说：“我们是老战友，相识45年啦！”张云逸当时说话已经困难，但他也紧紧握着邓小平的手，颌首示

意，目送邓小平缓慢退出病房。

1974年11月19日，一代骁将张云逸以82岁的高龄，走完了戎马生涯的最后征程，永远停止了呼吸。

历史不会忘记任何人的功绩。为人民服务的人，人民永远怀念他。

主要参考书目

1. 《将帅轶事》,胡志刚主编,华艺出版社 1989 年 6 月版;
2. 《十大将用兵韬略》,王乾都、蔡世经主编,黄河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版;
3. 《军事家传略》(下),张如贤、刘培一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6 年 7 月版;
4. 《一代元戎——大将徐海东》,张麟主编,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8 年 1 月版;
5. 《一代元戎——大将王树声》,范江怀主编,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8 年 1 月版;
6. 《一代元戎——大将谭政》,乔希章主编,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0 年 1 月版;
7. 《一代元戎——大将肖劲光》,胡学庆、孙国主编,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8 年 1 月版;
8. 《一代元戎——大将张云逸》,于波主编,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9 年 3 月版;
9. 《一代元戎——大将黄克诚》,郑博、肖思科主

编,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1 年 1 月版;

10. 《十大将传记——粟 大将》,郑乃臧、王楠主编,海燕出版社 1987 年 8 月版;

11. 《十大将传记——罗瑞卿大将》,穆静、冰如主编,海燕出版社 1987 年 8 月版;

12. 《十大将传记——谭政大将》,乔希章主编,海燕出版社 1987 年 8 月版;

13. 《十大将传记——陈赓大将》,左波主编,海燕出版社 1987 年 8 月版;

14. 《十大将传记——黄克诚大将》,左林、周航主编,海燕出版社 1987 年 8 月版;

15. 《十大将传记——张云逸大将》,罗永平、曾傅先,海燕出版社 1987 年 12 月版;

16. 《三次大难不死的罗瑞卿大将》,黄瑶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4 年 6 月版;

17. 《开国大将的故事》,石仲泉、陈登才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 5 月版;

18. 《大将许光达》,王嘉翔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7 月版;

19. 《开国大将的晚年岁月》,许农合主编,北京出版社 2001 年 1 月版;

20. 《开国十大将之谜》,木兰主编,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4 年 4 月版;

21. 《大将粟裕》,徐学初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3 月版;

22. 《新中国第一代——军兵种、大军区司令员卷》,文辉抗、叶健君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9 月版;

23. 《中国十大将》(上、下卷),王晓明主编,长征出版社 2003 年 6 月版;

24. 《将之战》,多人主编,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7 年 6 月版;

25. 《世界著名军事家的少年时代》(续),陈春华、谷丰主编,解放军出版社 2000 年 1 月版;

26. 《中外名将实战录》,王虎、秦晓周、贾俊明主编,北京出版社 1995 年 3 月版。

附：阅读测试题

一、填空题

1. 张云逸幼时取名 _____ 乳名 _____, 稍长大一点, 他又用过 _____ 的名字, 参加革命后, 他根据广东话 _____ 二字的谐音, 改名 _____。

2. 1931年7月, 为褒扬红七军的 _____, 中共中央和 _____ 政府特奖给大红锦旗一面, 上书四个大字: _____。

3. 1945年, 张云逸根据中央的批示精神, 决定新四军首先出击 _____ 和 _____ 城, 占领这两个苏北的战略要地。

二、选择题

1. 1911年, 张云逸参加了 _____。

- A. 白朗起义 B. 武昌起义
C. 黄冈起义 D. 黄花岗起义

2. 1934 年底,张云逸协助 _____ 突破了乌江。
- A. 邓小平 B. 刘伯承
C. 聂荣臻 D. 徐向前
3. 新中国成立后, _____ 香烟不但驰名全国,而日它还是张云逸大将军的“专利”。
- A. “ 龙泉 ’牌 B. “ 飞马 ’牌
C. “ 熊猫 ’牌 D. “ 骆驼 ’牌
4. 1947 年, _____ 创造了一次歼敌 7 个师的范例。
- A. 华东野战军 B. 华北野战军
C. 华中野战军 D. 东北野战军
5. 1949 年 9 月,中共中央决定由张云逸主政 _____。
- A. 广东 B. 广州
C. 广西 D. 江西

三、问答题

1. 令张云逸终身难忘的是一件什么事？
2. 1929年由邓小平、张云逸领导举行了什么武装

起义？

3. 1933年八一建军节，中央军委授予张云逸一枚什么奖章？

4. 张云逸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为什么享受元帅待遇？

5. 全国解放后，张云逸是怎样对待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的？